



厦门大学红色文化研习营
研习报告
(第一季)

红色记忆：地方叙事中的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教工党支部

2024年3月

建宁苏区的革命宣传动员探析

吴思怡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频繁的战争导致红军兵力损耗眼中，转入农村工作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与当地群众建立起密切联系，增强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于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县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宣传动员运动。中国共产党从经济、思想、教育和军事上对建宁人民展开全方面的教育，宣传国民党的反动行径，强化苏区人民的阶级观念，号召建宁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卫苏区。而这些宣传动员记忆被文史资料记载了下来，本文从文史资料出发，探寻建宁人民视角建宁革命宣传动员。

关键词：建宁；革命动员；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 年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2 月至 4 月，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一十八团及第十二师一个 30 多人的工作团先后从南丰的傅坊、广昌的尖锋进入建宁西北地带开展工作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纲领，在桂阳、陈家排、贤河、伊家湾、水南桥宁家源、溪头坑、芦田等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及农会贫农团等组织，组建了桂阳、宁源两支游击队，吸收 100 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开辟了建宁西北部游击区，为建宁苏区的创建打下了基础。同年 5 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5 月 31 日建宁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创建建宁苏区。6 月至 7 月上旬，建宁成立了县级红色政权一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 5 个中心区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各级工会农会、贫农团、妇女会、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并在全县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按人口分配了土地，建宁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同年 7 月 10 日前后，红军为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从建宁等地千里回师赣南，建宁县复为白军所占。1932 年 10 月 16 日，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的领导下，趁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从广昌兵分 5 路发起建（宁）黎（川）泰（宁）战役。10 月 18 日至 19 日，红军连克建宁、黎川、泰宁

3座县城。10月下旬，成立中共建宁县临时县委，书记由中共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兼任，隶属江西省委。1933年1月中旬，余泽鸿从江西带一批地方干部达到建宁，成立中共建宁中心县委，领导黎川县委泰宁县委和建宁县各区委，负责建宁、黎川、泰宁三县的工作。在中共建宁县委和中共建宁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建宁苏区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建宁苏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经济、思想、教育、军事等方面广泛动员建宁人民，投入苏维埃建设和中国革命运动。

建宁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建宁文史资料》是当地人关于本县地方史料、革命斗争、山川地理的重要叙述，通过文史资料，可以窥见当时亲历中央苏区的人对当时的历史情境的描述，了解建宁人民眼中的苏维埃革命，了解当时红军和国民党斗争的人民记忆，里面很多关于建宁在苏区时期的中共革命、国共斗争和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活资料”。本文拟以建宁的地方文史资料为核心，探究建宁在苏区时期的革命宣传动员工作，使得对建宁这座反“围剿”的英雄城市背后的经济动员、思想政治动员、学校教育动员、军事动员等历史事实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经济物质动员

在国民党反动派实施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背景下，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红军战斗的物资也很大程度上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建宁苏区，中国共产党充分动员农民、工人、工商业者为战争提供粮食、日用品等物资，为红军战斗提供充足的后勤物资准备。中国共产党对建宁工商业人员采取友好政策，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如建宁县原在溪口青云巷开设“春复祥布店”的崔仁山老板，被人诬告是土豪劣绅，当过商会会长。当时的“闽赣军区政治部”展开调查，调查完毕后，当晚的十一点中崔老板毫发无损的回到家中，当时红军同志还说“请你清点封存的货物，如有损失，可申请偿还”。人们议论纷纷“红军真的不会错办一个好人。”这件事情在建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个别过去还有顾虑的人也返城回店经营生意了，工商界人士了解了共产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后，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想方设法从白区弄到货物，供应本县军民的需要。

还组织货源支援了中央苏区，为反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做出了贡献^①。可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对革命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另外还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动员，对于农村具备粮食的重要物资的优势给予了充分地发挥。苏维埃政府的购粮政策吸引了诸多农民向红军出售粮食。据建宁当地人口述，当时红军购粮并不是简单交付，还会在买粮食前进行宣传购粮意义，找农会干部开会商量好收购价格和收购办法，委托干部下村购买粮食。运粮费用由路程决定，全是现金交易，支付的苏维埃纸币可以向苏区银行兑换大洋，这样农民都很高兴把粮食卖给红军。没过几天就收购到很多粮食，两个多月的时间红军共收购了两万多担粮食后来群众还自发送粮进城到收购站出卖^②。农民愿意卖粮食给红军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红军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在战斗，正如标语所说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替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与资产阶级反动派鱼肉人民具有根本的区别，在民初军阀时期，建宁县的田赋征收机构是在县城设的粮局，由粮总（头目）负责全县征粮任务。各乡设有分柜，分别向业户直接征收粮税。其征粮手续，是逐村逐户，催收粮款。有些演变为包干制，包收包缴全县田粮税款若干元，定期追比，否则受罚。粮司又将定额分包各乡征收人员。结果层层渔利，吞食贪污，加重民间负担^③。红军的购粮政策遵循平等原则和市场规则，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红军还组织建宁人民自己组成游击队，为自身物质利益争取，比如对当地土豪的打击。“宁源成立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宁茂云，组织了二十多人得游击队，队长是李细阔，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打了压迫农民的黄成才、宁广怀、潘盛芳、翟赵钱几家大土豪，把他们的谷子分给穷人吃，土地又要分给穷人种，我们实在高兴，农民踊跃加入农会与贫农团，参加游击队和红军。^④”

正如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上所说：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

^① 崔源生 徐立义：《政策正确 深得人心》，《建宁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20-22页。

^② 余细供口述：《建宁是中央苏区的粮仓》，《建宁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10页。

^③ 范文蔚：《建宁过去征收田赋粮食的简况》，《建宁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42页。

^④ 翟美松：《鹿山星火》，《建宁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16-17页。

一点也不能看轻”。这是“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建宁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护建宁人民的经济利益，为贫苦农民夺取土地，保护合法合理的工商业收入，这都为建宁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思想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在建宁开展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教育，采用标语、话剧报刊等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罪行，宣传苏维埃的人民立场和伟大理想，促进广大建宁人民革命思想的树立。由于主要在农村开展工作，醒目、顺口的标语宣传是苏维埃政府思想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建宁县溪源公社东溪大队坊上村余家祠堂的两边花墙上，至今还保存着两条红军时代的标语。一条是“反对军阀混战”，一条是“武装拥护苏维埃”，落款是州五军红一军。每字约一米见方，字字苍劲有力，醒目如新^②。1932年秋，红军在第二次进入建宁城之后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毫无疑问是将国民党反动派的负面形象广泛宣传，引起广大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憎恶。在建宁当时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驻扎在城内熊家岭艾家屋（现物资局大楼所在地）上就涂写了一大字标语：“国民党”十大罪状，里面的内容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背叛中华革命，屠杀工农群众。帮助资产阶级，禁止工人罢工。庇护土豪劣绅，加重租利剥削。克扣士兵军饷，以饱军阀私囊。抽收苛捐杂税，剥削工农小商。强行党化教育，束缚青年思想。取消民众团体，剥夺言论自由。滥发公债钞票，骗取民间现金制造军阀混战，酿成全国大乱。”^③这种醒目的标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吸引成千上万群众观看。其实在白军刘和鼎驻入建宁时，建宁人民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义愤填膺。“这些白军一来就拆民房修工事，放战马毁稻田，抓鸡抢物品，强奸妇女，老百姓又受到一次兵灾的痛苦，大家更盼望红军的到来。”^④而标语宣传对于揭露国民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36页。

^② 余文：《两条保护完好的标语》，《建宁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23页。

^③ 袁克：《一幅红军标语》，《建宁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7-8页。

^④ 徐立义：《出席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前后》，《建宁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35页。

丑恶嘴脸，激发劳动人民的革命义愤，扩大红军工作，加速革命的发展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除了将标语宣传进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国共产党还在建宁各种公共事业的建设上渗透革命思想的宣传，在科教文卫等方面来唤醒广大建宁人民的革命基因。比如在建宁苏区的人民，经常听到《打渔杀家》、《送郎当红军》等这样的节目，流行歌曲也有革命阶级立场鲜明，内容新颖的《暴动歌》、《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少年先锋队歌》、《共产儿童团歌》、《革命胜利》《慰劳红军》、《红军打沙县》、《提早春耕》《识字歌》《十劝妹》等，还出版了《斗争》、《党的建设》、《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红色儿童》《苏区工人》《红色闽赣》、《红色射手》《红色闽北》等十余种报纸、刊物^①，这些都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对建宁群众的革命宣传动员广泛开展，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革命思想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这些苦难都被坚韧的共产党人克服。一位曾在《红色闽赣》报社工作的人员回忆道：“当时处在战争状态，印刷地址难以固定，要经常迁移，条件艰苦。没有铅印，是用石印。其工具有大青石板，手摇铁架石印机，各种油墨笔、墨滚等。最初在建宁城内创刊印刷，后因时局关系，转移到水南，再搬到吴家，又再迁到双溪、都上，继而搬到澎湃（现在宁化的安远司）的李坑，最后迁到宁化县城。短短三、四年间，七迁印刷地址。^②”报社的安全存在问题，宣传材料也非常紧缺。“印报纸的油墨买不到，大家就想方设法用桐油、松香、乌烟加火熬成，自制油墨。上石板的药水纸没有，就用棉纸、桃胶、面粉等制成。^③”可见在建宁人民的记忆中，中国共产党和广大贫苦群众更加亲近，愿意吃苦耐劳，面对简陋的条件能够及时地处理，不耽误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动员对于建宁人民树立对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强化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心理具有重要作用，标语、话剧等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建宁人民当时每次办活动的时候都会提些口号：“建

^① 杨才文：《建宁苏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建宁文史资料》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文史资料组编，第13页。

^② 徐文孙：《艰苦岁月里的〈红色闽赣〉报社》，《建宁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文史资料组编，第4页。

^③ 徐文孙：《艰苦岁月里的〈红色闽赣〉报社》，《建宁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文史资料组编，第5页。

设苏维埃，大家来革命！”“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宣传婚姻法实行男女平等时候，会编顺口溜：“革命同志不比先，讨个老婆不要钱！”^①

三、学校教育动员

中国共产党做好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将共产主义信念灌输到群众心中。毛泽东在建宁的时候就督促干部要学会搞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1931年6月，毛泽东同志到康都主持总前委扩大会议后，回到建宁的渠村中心区时，从群众中了解到杨林游击队不善于走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听到“土豪”就打，听到“经商盘剥”就罚，没有很好的执行政策。毛泽东就找来游击队队长，对他解释党的政策，说明不能侵犯中农利益，要保护工商业。列举了红军对在建宁城里没收“绥安中西医院”这种违反政策和纪律的做法做了严肃处理，来教导地方游击队要学会搞调查研究，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②。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建宁的时候非常注重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坚持群众工作办法获取当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以便壮大党的力量。还有参与过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的建宁人民也回忆道当时各大代表来到瑞金时，接受了不少教育和培训。苏共二大结束后有《打渔杀家》、《杨家将》等的演出，还有党校、红校、步校、卫校和戏校的参观，最后举行联欢会欢送代表，各个代表豪情满怀，互相祝愿^③。从这名代表的回忆中看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系统建设相对较完备，对于干部培训也有较为合适的场所。并且徐立义在会议结束后留下了培训，据回忆当时的步校氛围高、低级班，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几门，发有《资本论》、《中国与革命》、《列宁论左派幼稚病》、托洛茨基派》、《苏联红军步兵操练》、《论游击战》和中国史地、生理卫生等各种书籍。政治、文化在校内讲堂上课，军事、体育在校外野地进行^④。可见当时苏维埃政府也非常注重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设立干部学校，动员广大干部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奋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授给干部

^① 翟美松：《鹿山星火》，《建宁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16-17页。

^② 曹嘉忠：《毛泽东同志在建宁》，《建宁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4-5页。

^③ 徐立义：《出席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前后》，《建宁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39页。

^④ 徐立义：《出席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前后》，《建宁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39页。

群体，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

建宁苏区还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建立完满的小学制度，在成年人中开展扫盲运动。当时建宁不少地方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和夜校识字班，参加夜校和识字班的对象，一般是15岁以上不识字的男女群众^①。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师资者当教员，以民教民，开展业余教育。苏维埃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部队、地方武装，以及工会、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解放委员会等群众团体，都把办好文化教育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之一，他们把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所用课本，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本，如团中央编发的《青年读本》、红军总政治部编发的《红军读本》、闽赣省文化部编发的《工农识字课本》等，均以韵文形式编写。如《工农识字课本》第十七课的内容是：“土地革命，解放穷人，没收土豪土地，分给穷苦农民。”它既通俗易懂地讲了革命道理，文字又易认易记^②。还有的课文内容是：“革命，革命，向前进！”“苛捐杂税，杂税苛捐，真要穷人命。”“工人和农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要想不苦，就要革命。”“土地革命，解放穷人，没收土豪田地，分给农民。”

建宁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编写的课本，还翻印了毛泽东为红军编写的课文：“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泥瓦匠自己没有屋，我缝自己穿破衣服，为什么这样？被人剥削的缘故^③。除此之外，红军还在建宁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当时的“红军歌”流行全县，如“送郎当红军”、“十剪发”等，不仅教育了群众还慰劳了红军，有力地推动了建宁苏区的革命斗争。

四、军事动员

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建宁人民和组织的力量，鼓励农民、工人加入红军、游击队，社会组织为红军后勤、前线出钱出力，扩大革命队伍，为建宁地区的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张运贵是经过红军宣传后加入红军游击队的建宁群众，他的

^① 杨才文：《建宁苏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建宁文史资料》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文史资料组编，第13页。

^② 余文：《建宁苏区的文教卫生建设》，《建宁文史资料》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文史资料组编，第21-22页。

^③ 杨才文：《建宁苏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建宁文史资料》第1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县委文史资料组编，第10-11页。

回忆反映了当时红军在中央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我才十九岁，家离桂阳三里路，正月初四那天挑柴到贵阳卖，看见关帝庙前开会，有红军在宣传讲话。我听到的话是‘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替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在贵阳住了十几天，就有许多青年报名参加红军游击队。我经红军宣传动员，也报名参加了游击队。^①”另外建宁的一部分组织也在红军革命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力量。第五次反围剿，建宁工会组织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参加罢工斗争，一部分武装工人加入游击队，参与前线斗争，在后方的工人也负担警戒任务，加强对资本家、老板的监督工作，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慰劳队上前方，支援红军作战。中共闽赣省委、军区、县苏维埃等机关，曾为他们举行茶话会进行表彰，更加提高了工人斗争的积极性和坚决性^②。建宁还为红军输送了大量的兵员，当时有首歌谣说红军在建宁“扩红一千多、筹款十五万”。1933年4月安寅区上龚乡15天扩红38名，被《红色中华》登报表扬为扩红模范乡，该乡交通员丁美贞一人10天扩红36名，被评为光荣模范。1933年5月，少共中央发出创立“少共国际师”号召，8月少共国际师成立，闽赣省各级团组织热烈响应，原定从闽赣省征调2000人，结果报名完成2600人，建宁组建了一个团，视头、杨林、双溪、上龚家安寅等10个乡成为创建“少共师”模范乡。地方武装独立团、游击队赤少队则常常整排整连整团地参加主力红军，调走一批，又重新组建一批，不断补充到红军中去。1932年10月，南广建独立团编入红十二军三十五师，随后另行组建了建宁独立团和建泰独立团。1933年4月，又将各区、乡少先队模范营连集中整编，成立建宁模范少先师。7月，建宁独立团建泰独立团、建宁模范少先师编入红七军团。8月，建宁苏区又重新组建了建宁独立团、里心独立团和闽中独立团1934年亦先后编入红七军团第十九师^③。建宁还是红军的转运中心，组织人民上前线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等。红军回师赣南的时候，建宁组织了800多人的运输队、担架队随军出征；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时，建宁发动4000余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出发，帮助红军运送军粮、武器、伤病员和战利品。

^① 张运贵口述：《桂阳风暴》，《建宁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11页。

^② 胡金祥：《三十年代的建宁红色工会》，《建宁文史资料》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宁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第16页。

^③ 陈忠奋. 土地革命时期建宁苏区的地位和贡献[J]. 福建党史月刊, 2008(S2):31-34.

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宣传动员的成效直接决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在建宁苏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土地革命、扩红运动和各种舆论宣传从经济、思想、教育和军事四个方面广泛动员建宁群众，建宁人民心中留下了对共产党、苏维埃的美好印象，也让建宁的革命斗争更具凝结和强大。共产党的革命宣传动员与建宁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益攸关，实现了革命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对群众的启蒙，使得建宁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诏安无抗战？

——基于《诏安文史资料》的研究

昌意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诏安无抗战”的观点既不符合事实，也抹杀了诏安光辉的抗战历史。诏安作为福建的南大门，曾被日寇 3 次侵犯，但在诏安县军民的团结抗战下，日寇阴谋没有得逞。本文以诏安的社会组织、共产党组织、国民党组织作为主体，分析这三类主体在抗战中的具体表现，通过表现得出诏安的社会组织和共产党组织始终团结一致、积极抗日，成立各种救亡组织和团体，而诏安的国民党政府则是消极被动抗日。但是三类主体都在诏安抗战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也直接说明了诏安存在抗战经历，证明“诏安无抗战”是错误的观点。

关键词：诏安；抗战；共产党；国民党

至今仍流传“诏安无抗战”的观点，但此观点既不符合事实，也抹杀了诏安英勇的抗战事迹和光辉的抗战历史。诏安作为福建的南大门，位于闽粤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直被日本侵略者觊觎，曾 3 次被侵犯，县城两度沦陷，但在诏安县军民团结一致的抗战下，敌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每次都以溃败告终^①。

《诏安文史资料》中也明确记载了诏安人民从 1937 年至 1945 年的 3 次具体的抗日斗争过程，以及林晓、谢荣光、沈向奎等抗战英雄的英勇事迹，这些都表明诏安真实存在抗战经历。诏安的社会组织、共产党组织、国民党政府都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则以他们作为研究主体，分析这三类主体在诏安抗战中的具体表现，以此证明“诏安无抗战”是错误的观点。

一、诏安的社会组织在抗战中的具体表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爆发。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各地纷纷响应，成立了各种救亡

^① 谢继东：《诏安抗战记略》，《诏安文史资料》第 17 期，1997 年，第 1 页。

团体，蓬勃开展救亡运动。抗日刻不容缓，诏安人民也迅速成立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是诏安的爱国学生，在抗日的救亡声中，行动起来，走上抗日的道路。一些在漳州、厦门、上海等地求学的诏安学生，在形势的影响下，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选择回到家乡成立救亡团体、救亡组织。1937年，以厦门大学学生张源、华北大学学生谢腾飞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回到了诏安，以“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结业的学员为主要力量，组织了“诏安旅外回乡服务团”，开展抗日宣传，打响了诏安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炮^①。“回乡服务团”首次在城关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表演生动逼真，很快就让演员与群众打成一片，后又举行一次盛大的火炬游行活动，高唱《自由神》等救亡歌曲，让整个诏安城沸腾起来，极大振奋民众的爱国救亡之心。“回乡服务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它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并使成员在思想意志上得到锻炼。如团员中的沈柔坚、陈松茂、林楠、许沙洛等，在第二年都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诏安当时很多中学的学生也毫不犹豫选择抗日。1933年冬，十九路军发动政变，福州当局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实行联共抗日政策，诏安中学的部分进步学生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很多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呼“拥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口号，一致要求联共抗日^②。之后，诏安的很多爱国学生还先后成立了“抗战青年社”、“诏安孩子剧团”和“诏安县巡回歌咏戏剧队”等救亡团体，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活动，包括写抗日标语、唱救亡歌曲、表演抗日剧、进行街头演讲等，大大增强了抗日宣传效果，鼓舞更多诏安人民加入其中。

其次是诏安的部分小学教师，他们认为爱国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播撒到城东小学、诏安中学和城关其他小学，对实施战时教育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出版了重要刊物《抗战》（共二期），成立了“城东小学儿童救国团”。此外，他们还在教学设计方面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增设时政课、在国语和历史地理等科目中补充一些能激发儿童爱国之情的教材、重视课外活动等^③，努力将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深入儿童的头脑和内心，

^① 许沙洛：《抗日救亡运动在诏安》，《诏安文史资料》第8期，1987年，第1页。

^② 谢绍美：《抗日烽火中的诏安中学》，《诏安文史资料》第17期，1997年，第15页。

^③ 许沙洛：《回忆抗战初期城东小学的战时教育》，《诏安文史资料》第11期，1991年，第8页。

让儿童从小便意识到保卫国家的重要性，这在诏安县的小学教育史上写下了鲜明且生动的一页。

再次，诏安的部分爱国商人也在抗日救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绅士沈淮三、工会会长许鉴明、工会会长许鉴明等商人毅然决然加入了诏安的国民党政府组织的“诏安各界抗敌后援会”，在抗敌后援会中通过出钱、出物的方式来支持抗战斗争。尤其是在筹备抗战工程方面，包括拆除城垣、破坏公路、修筑防御工事等工程建设，商人付出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除了学生、教师、商人等特定职业群体外，还有众多的诏安农民、工人也积极加入抗战救亡运动，包括加入各种救亡团体、参加抗日宣传队来宣传抗日活动等，绝大部分的诏安人民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支持抗日活动。在民族陷入危难之际，在日军的不断侵袭下，诏安人民深刻认识到救亡图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论哪个职业群体，都在积极支持抗日活动，组织成立各种救亡组织，动员身边群众参加救亡团体，为诏安战胜日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诏安的共产党组织在抗战中的具体表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是回乡服务团成员的林楠、许沙洛与爱国知识分子沈秋生、林士彬在诏安作为首批成员加入地下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诏城支部，并带动回乡服务团中的漳州义师班已经结业的十余名学员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①。随着地下党诏城支部的建立及壮大，在群众中逐渐贯彻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开展统战工作，这不仅是党的既定政策，也是特定形势的要求。抗战初期，诏安国民党当局，在诏安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月港事件”，逮捕和杀害了闽粤边特委代书记张敏和云和诏县、区委领导邓十多人^②，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沉痛且悲惨的教训。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国民党并没有表明抗战态度，那时，全国的爱国人士都同情、敬佩共产党，都表示愿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日。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公开承

^① 许慕辉：《历史不会忘却血写的岁月》，《诏安文史资料》第25期，2005年，第25页。

^② 陈文平：《云和诏地区统战工作的回顾》，《诏安文史资料》第11期，1991年，第36页。

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后双方坐下来谈判，最终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真正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出现，直接影响到了闽南地区，诏安也受此影响。诏安的共产党组织吸取了“月港事件”的教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本着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但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则采取针锋相对、无情揭露，坚持从斗争中求团结。

在诏安抗战中，地下党诏城支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虽然地下党组织的救亡运动屡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各种阻挠，但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坚持下去，用各种不同方式，时起时伏地进行抗战活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前后持续八年之久。1939年，拥护抗战、不满国民党无能的爱国青年龚健其带领回乡服务团的一些成员组织了“抗战青年社”，当时在诏安非常有名望的林仲姚、沈达才、沈光、沈炳华都加入其中。“抗战青年社”是以地下党员和其所联系的进步青年为骨干，进行更为广泛的抗日宣传的救亡团体。社员经常会发动城关小学和诏安中学的师生，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各项抗战宣传，每晚都会在楼上用广播简报宣布抗战新闻，形成特定的宣传制度^①。在那时，抗日救亡的歌声响遍诏安的大街小巷，还有各种各样的街头演讲会、街头剧、活报剧、漫画等，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抗战青年社还出版《抗战青年》刊物，一共三期，该刊物经常发表地下党员和林仲姚、沈达材等爱国学子的文章，宣传抗战必胜、投降必亡的救国道理，深受当时社会的关注。同时，地下党还在诏安中学建立了学校支部，党员有沈文陆、涂祖添、谢荣光等人，他们积极团结周围倾向进步的同学，组织多次读书会，自费订阅进步报刊二十余种^②，经常围在一起讨论抗战时局，交流学习心得，并创办《晓角》等墙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战英雄事迹，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和腐败现象。

同年11月，日军偷袭诏安县城，由于诏安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选择不战而败，日军则不费吹灰之力成功占据诏安县城。县城沦陷后，地下党诏城支部发动了诏中进步师生的30多人，组织抗日救国宣传队，在诏安溪东的美营、沈厝寨等村进行救亡宣传，指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县人民团结一致、

^① 许沙洛：《抗日救亡运动在诏安》，《诏安文史资料》第8期，1987年，第4页。

^② 谢绍美：《抗日烽火中的诏安中学》，《诏安文史资料》第17期，1997年，第14页。

共同抗日。在诏安军民的反攻下，日本侵略者成功被赶出县城。

诏安县城收复后，城关各小学却被国民党当局着令停课，学生则各自分散，城关的抗日宣传的基本据点和宣传力量已不复存在。后经地下党社会文部研究决定以厦门儿童剧团为榜样，由地下党员许沙洛、谢家群领导成立了“诏安县孩子剧团”，以留在县城的城东小学的学生为基本力量^①，以歌咏和戏剧为主要形式，先后演出了《谁说我们年纪小》、《古庙钟声》、《雪里红》等一系列抗战独幕剧，让一度沉寂的诏安县又重新听到了抗日救亡的歌声，再次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之心。

1943年，以地下党员为骨干成立了“诏安县巡回歌咏戏剧队”，队址设在中山公园的纪念堂，全队共十二人，队员中有地下党员四人，其他多是回乡服务团和抗战青年社中的积极分子，这些青年仍然保持坚定的爱国热情，积极赞成抗战到底、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巡回歌咏戏剧队坚持演出《生命之花》、《烟苇港》、《看谁先到重庆》、《桃李春风》等宣传抗战的著名话剧，除在县城的中山公园和许氏大宗祠前的广场公开表演外，还到四都、溪东一带乡下地区巡回演出。此外，戏剧队还成功举办一次“巡回木刻展”，全国各地知名的木刻家如野夫、刘伦、许霏等人也送来木展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以拥护抗战、坚持团结带有政论性的内容为主，还有一部分深刻反映了民间疾苦，这些作品首次在城关队址中山纪念堂展出，过后随戏剧队巡回演出送到了乡下巡回展出，这是诏安县唯一的一次颇具规模的木运^②。这些各种形式的抗战活动既丰富了抗日宣传内容，又为诏安艺坛增添光彩。巡回歌咏戏剧队的抗日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临近胜利之时才结束。

在诏安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仅和诏安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帮助了诏安的爱国青年积极成立各种救亡团体、救亡组织，积极宣传抗战，大大加强抗战的宣传效果，还坚持开展统战工作，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一起投入抗日救国之洪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不动摇，坚定不移走在抗日道路上。

^① 谢家群：《抗日救亡中的“诏安孩子剧团”》，《诏安文史资料》第11期，1991年，第36页。

^② 许沙洛：《抗战青年社和歌剧团的回顾》，《诏安文史资料》第17期，1997年，30页。

三、诏安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具体表现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蚕食鲸吞，占领我国东北、华北大片国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抗日战争中，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在全国人民的一致抗日声中，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表面上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宣布国共合作抗日。但在乌山革命根据地时，共产党却遭到国民党反共寒潮的袭击。1937年7月16日，闽粤边游击队领导人何鸣被驻漳州的国民党157师师长黄涛、政训处长李育培的“开明”假象所蒙蔽，把部队集中到漳浦，导致指战员等1000多士兵被缴械^①。同一天，在诏安开会的中共闽粤边特委代书记张敏等十三位同志，受到诏安县常备大队的袭击，被捕后全部牺牲。此次被称为“漳浦事件”，导致闽南的抗日武装力量受到重大损失。“漳浦事件”发生后，在中共中央、中共闽粤赣边省委的强烈抗议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妥协，同意归还部分人、枪，闽粤边区重新出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龙岩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集中在龙岩白土，整编后于1938年2月开赴抗日前线。

诏安的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的施压下，开始采取措施击败日寇。最突出的表现在成立“诏安各界抗敌后援会”，统一全县战时的宣传、动员、征募、救护工作。当时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成员包括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以仁、地方绅士沈淮三、中学校长黄慕周、农会会长许楚帆、工会会长许鉴明等人。抗敌后援会内设总务、宣传、组训、征募、救护等股，以许以仁、黄慕周为首的宣传股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对战时宣传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诏安原本无办报，为了宣传抗战的需要，国民党诏安县党部开始出版宣传报道抗战的报刊，规定在抗战开始后的第2个月起，每天晚上都指定专人直接收听南京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把全国各地开展抗战的消息记录整理，摘要誊写，印发百余份，供县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单位阅读并张贴街头，让关心时事的群众了解形势^②。此外，国民党政府还注重组织各种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国民党县党部组建诏安县抗敌剧团，演出形

^① 沈大纹：《抗战初期诏安的战备工作》，《诏安文史资料》第8期，1987年，第8页。

^② 许发：《抗战初期国民党诏安当局的战时宣传》，《诏安文史资料》第11期，1991年，第100页。

式多种多样。演出的地点从县城到农村，如高坑、华表、西潭、四都等地，都有剧团人员的足迹。他们所到之处，除了演出外，还绘漫画、写大标语，进行口头宣传。当时唱的抗战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之后以诏安中学、城区各小学和国乐研究会为主体，用歌咏、话剧、潮剧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国民党政府非常重视军事建设，设立了一系列兵团组织，以便提高军事抗敌能力。首先，设立了诏安县杜训总队（后改称国民兵团），主管诏安全县壮丁的编组、训练和指挥事宜；其次，设立了诏安县民众抗日自卫团，负责组织诏安人民参与军事训练，形成自卫团；再次，设立了战时防空指挥部，任务是进行防空常识的教育，统一领导防空设施，设立警报站，实行夜间灯火管制^①。同时，国民党政府在战备工程上也做足准备，进行了拆除城垣、破坏公路、修筑防御工事等工程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备工程虽是国民党组织，但其背后是诏安的普通群众的艰辛付出，他们提供了艰苦的劳动和大量的财力、物力才成功修缮这些战备工程，国民党只开展前期统筹准备工作。在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再次撕破了假面具，掀起反共高潮。诏安县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也挥起屠刀，先禁止《抗战青年》等一系列抗战报刊的出版，又查封了“抗战青年社”等救亡团体，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完全丧失了原先的抗日朝气，在抗战后期再也没有进步的表现可言。

必须承认的是，国民党政府在诏安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军事组织和抗战宣传方面，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诏安的国民党政府是被迫抗日的，对抗日持有消极态度，其实质仍是反共反人民的，以至于在抗战后期直接撕下面具，停下抗日的脚步，来迫害共产党和人民。

四、结语

通过对诏安的社会组织、共产党组织、国民党组织三类主体在诏安抗日战争中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共产党组织始终坚持抗日救国、积极抗战，呼吁、团结诏安普通民众一致抗日，最先觉醒的诏安青年、教师、商人和地下党诏城支部合作成立了各种救亡团体、救亡组织、宣传队，积极宣传抗日事迹，极大加强抗日宣传效果，激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人民加入抗日洪流。

^① 沈大纹：《抗战初期诏安的战备工作》，《诏安文史资料》第8期，1987年，第10页。

相比之下，诏安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在抗战中采取了重要举措，注重军事组织和加强抗战宣传，但不同的是，诏安的国民党政府是在共产党的强烈抗议下，被迫妥协选择抗战，国民党政府一直对抗日救国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以至于在抗战后期直接放弃抗日去迫害共产党和人民。但总的来说，三类主体都在诏安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也直接表明了诏安存在抗战，深刻证明了“诏安无抗战”是一个不符合事实、不尊重历史的错误观点。

才溪人民创建模范乡的主要经验

郑婧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才溪人民在红四军的策应支持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建立了红色政权。为了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才溪人民从青年男子到妇女儿童在扩大红军、生产建设、政权建设等方面为苏区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才溪被授予“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的称号。才溪人民创建模范乡的经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苏区建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才溪；模范乡；文史资料

才溪镇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西北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中央苏维埃政府授予“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称号，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面红旗。才溪之所以能成为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离不开才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等方面所创建的光辉业绩，也为当时苏区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一、全力推动“扩红运动”

1929年7月21日，上杭才溪人民暴动成功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扩大红军热潮。首先是政治上的宣传动员。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反围剿”，保卫苏区，巩固苏维埃政权，才溪人民把大批青壮年男子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红军中去。其中“曾坑团支部全体团员加入红军，同康少先队大队长王大青，为了苏维埃的巩固和发展，鼓动丈夫当红军。曾坑党员王来金带领了9个人一起当红军，上才溪丘仁和、王发尧两人自动报名后又带了12个人当红军去。”^①1932年1月至4月，才溪乡有109人参加红军，并且在此次扩红比赛中成为了人数最多的乡。同年8月至9月，才溪又有108名村干部和赤卫军报名当了红军，10月13日，还有120多人报名当了红军，全区700多人特意参加

^① 刘宝联：《才溪乡的扩红运动》，《上杭文史资料》第15期，1990年，第12页。

了欢送新战士入伍大会。1933年11月14日,《红色中华》报刊登消息赞扬才溪的扩红运动:“才溪区顶瓜瓜,数量又多,成分又好,党团员也不少,欢送的一队队,慰劳品一担担,最整齐,最出色,政治影响最大,优胜红旗两把给他们取去了。”^①这样大数量的扩大红军,离不开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当时,村里、乡里成立了民歌队,田头山岗村前屋后都可以听到《十送郎》、《莫念家》、《十劝妹》等扩红山歌,这些山歌通过对红军的赞扬鼓舞了更多的才溪人民加入到了红军的队伍中。另外,最早报名成为红军的积极分子组成了“冲锋队”,现身说法带动群众,这种“以兵带兵”的方式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再者,新战士入伍前,乡苏主席亲自召开家属座谈会,为即将出征的战士送上路费、衣服、干粮等物资,“新战士临走之前,党团员积极分子组成‘义务冲锋劳动队,’到新战士家里打扫房屋、砍柴挑水,做‘冲锋劳动工’,苏维埃政府在新战士离开家前,召开群众大会授予光荣牌。”^②

如果说广泛的政治宣传动员了大批才溪人民加入了红军,那么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则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并且这也是使青壮年留在红军部队的一项最根本工作。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以及全体工农群众,都十分重视和关心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他们制定了各种优待红军条例,各区均成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和“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对于义务种红军公田、红军子女免费读书、红军减价购买商品、红军婚姻问题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时,红军家属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政治荣誉,在生产、生活上都得到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比如:在红军家属门口挂光荣牌匾,写上“当红军最光荣”,胸前挂“红军家属证章”,手里有“红军家属优待证”、“优待红军家属购物证”等等。并且,为了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乡、村里的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如果红军家属存在特别困难的情况,比如缺柴、米、油、盐等,群众都会进行募捐。再者,每当红军部队经过或驻扎在才溪地区时,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前往慰问。如召开慰问红军大会,组织文艺队前往红军驻地慰问演出,送布草鞋、毛巾、袜子、猪肉、鸡鸭等。^③1933年4月,红十九军和一二纵队开往前线,经过才溪时,群众自动送米菜、送柴火,这次总计慰劳品有:“猪肉800斤,松柴813担,青菜282

^① 《红色中华》第125期,1933年11月14日。

^② 刘宝联:《才溪乡的扩红运动》,《上杭文史资料》第15期,1990年,第14页。

^③ 刘宝联:《才溪乡的扩红运动》,《上杭文史资料》第15期,1990年,第17页。

担，布草鞋 400 多双，并且动员了 450 个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衣。”^①

才溪乡扩红运动的背后还离不开才溪妇女的艰苦付出。才溪妇女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积极参与扩红支前运动。出现了“百名妇女送郎当红军”、“千个母亲送子参军”、父子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大批的青壮年男子参军去了，留在家乡的妇女们勇挑生产、支前重担。她们学习犁田、耙田、蒔田，白天没学会的，晚上趁着月光再学，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红军家属用冲锋比赛的精神来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以争取生产战线上的胜利。此外，才溪妇女们为了支援前线军队更好地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她们除了增产粮食和农副产品外，努力做好各项支前工作。她们编织的草鞋战士们特别喜欢穿，而且数量也很多，“上才溪，8 月 500 多双，9 月 100 多双，10 月 90 多双。下才溪，8 月 300 多双，9 月 280 双，10 月 300 多双，11 月 630 双。”^②此外，她们还组织洗衣队、看护队、慰劳队、担架队，坚持优待红军家属的原则，从各方面去协助红军打好仗，养好伤，治好病。不仅是才溪妇女，才溪乡的儿童于 1929 年 10 月成立了“共产儿童团”，每当红军来到才溪时，儿童团都会下门板、抱稻草替红军铺床位，并且响应共青团的号召，帮助军属做事，替军属除草、挑水、砍柴、放牛等等。^③儿童团和才溪妇女共同组成了对敌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

二、协力发展苏区经济

才溪之所以能掀起扩大红军的热潮，离不开经济建设的配合，只有建设好苏区，才能使苏区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土地革命的胜利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为了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保卫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果实才溪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由于每年大批青壮年男子加入红军的队伍，留乡生产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发展生产与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妥善解决这个矛盾，才溪人民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于 1931 年夏收季节，在耕田队的基础上，创办起了体现群众阶级互助精神的全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因此，“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④才溪劳动合作社，是以乡为单位组织的，合作社的任务是帮助红军家属以及开展群众性的互助，有组织地

^① 《才溪工农再一次慰劳》，《红色中华》第 37 期，1933 年 4 月 26 日。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2 页。

^③ 楚芳，启芳：《才溪乡的共产儿童团》，《上杭文史资料》第 3 期，1983 年，第 31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32 页。

调剂劳动力，在不改变个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互助生产，劳动竞赛。劳动合作社坚持互利的原则，合理计算劳动报酬，社员之间的互助，是按工日计算工资。各社员帮了别人多少天，请了多少工，都由委员会先分户定记，不付现钱，农忙结束后，公布各户来往工数，让社员查核。^①由于才溪劳动合作社有效地调剂了劳动力，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使全乡农业生产很快超过了暴动前的生产水平。1933年比1932年，粮食增加了二成，杂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②农业生产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保障了红色区域的军需民食，也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同时，才溪乡的互助合作运动，成为了生产互助的一面光辉旗帜，为苏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1929年红色军入闽后，闽西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面暴动，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带来了异常的困难。为保障苏区军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1929年11月中共闽西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除痛苦，在目前应努力帮助建立合作社之组织”^③，以图解决工农业生产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根据新的形势要求和特委的指示精神，才溪人民创立了闽西第一个合作社——才溪区消费合作社分社。消费合作社在为群众谋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学会做生意，积极改善经营方式，力求做到使合作社有所积累。据记载，到一九三一年底结账时，除一切开支外，共得存余大洋三百元。营业的资本均由社员筹集，赚来的红利由社员大会决定，照社员的股金份数，发回每股红利伍角。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才溪区消费合作社社员已发展到一千零四十一人，股金共一千零四十一元。^④此外，为保障苏区军需民用的供给，消费合作社在赤卫军的协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积极组织米谷、烟叶、土纸、黄豆等向白色区域出口，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采办物资，运进食盐和布匹等急需品，从而改变了过去进货依赖小商小贩以及当地商店的被动局面。在苏维埃政府的直接关怀下，才溪消费合作社还建立了“社员大会”最高权力机构，在会上讨论和决定合作社的方针及一切有关本社的重大事件。为鼓励工作人员积极工作，社员还自动替缺劳动力者耕田并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些行之有效的措

^① 林焕珍，高永雄：《才溪苏区劳动互助社》，《上杭文史资料》第2期，1982年，第40页。

^② 林焕珍，高永雄：《才溪苏区劳动互助社》，《上杭文史资料》第2期，1982年，第41页。

^③ 《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龙岩：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第290页。

^④ 刘涟：《闽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上杭文史资料》第6期，1984年，第31页。

施，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迅速发展，各种合作社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据 1933 年 7 月统计：“才溪全区有三十二个消费合作社，二个布匹合作社，一个粮食合作社，三个药材合作社，共有股金二千五百三十一元，每股股金伍角以上，至伍元为止。”消费合作社的发展，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迅速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平。1934 年 1 月 1 日，《红色中华》专门刊发文章，明确指出：“在合作运动中，上杭的才溪区是模范的一区，虽然在他〔它〕的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但是才溪区消费合作分社的工作已能使我们得到许多经验和教训。”因而号召大家“来学习它的光荣模范”。^①

才溪的经济发展不仅得益于合作社的建立，而且也离不开才溪妇女在生产建设的努力。时才溪妇女成立了 77 个生产教育组，每十个妇女编成一组，学习犁田、耘田、耕田。如在 1934 年 3 月 15 日《红色中华》报道：“上杭才溪，在春耕运动中，有十分之八的女英雄参加犁田、耙田，聘请了生产指导员经常教授妇女耕作技术。”由于妇女干部带头干，其他的妇女也跟着干起来。妇女们在学习过程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精神，仅仅两年时间，才溪全区 3000 个妇女中，能犁田、耙田的共有 1600 多人，特别是红军家属，用冲锋比赛的精神来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以争取生产战线上的胜利。由于广大妇女和后方革命群众的积极努力，农业生产逐步有所发展。据 1933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到才溪调查，记载了当时的生产情况：“1932 年恢复了 10%，今年（1933 年）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木薯等，则比去年增加 50%），超过暴动前 10%，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 1300 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一片田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了。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很大。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果子’的，没有蒸酒的。”^②

三、共同参与政权建设

^① 周雪香，江冰蓉.《苏区经济合作化的光荣模范——基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考察》，《北华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2 页。

为了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才溪人民一方面充分发扬民主，运用选集的办法，把一批最有觉悟、最先进、最有能力、有经验、懂政策的积极分子选进苏维埃政府里去，使他们能起到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运动，吸收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各级政府工作，保证了政权机关的高度纯洁性。另一方面，健全各乡代表会议制度和实行巡视制度。村代表每周需向乡苏报告一次工作，乡苏每 10 天需向区苏报告一次工作，区苏主席团 5 天需召开一次会议，执委会每月开会一次，讨论具体工作计划和各项重大问题。同时，区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把乡区全体干部培养成为群众工作的模范。才溪区、乡苏维埃干部深入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每位苏区干部出门随身只带一个公文包和一个饭包，但他们每天的报酬只有 1 角 5 分钱的菜金，区苏规定每个工作人员每月必须自带伙食 4 天。所以各乡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才溪的妇女在党组织的号召下，也冲破了家庭的束缚，与男人一起参加武装暴动，共同参与政权建设。在才溪，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 5 人，内推一指挥员，另外四人分别在四个村，每村分配一人为村主任。同时，为了保证妇女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规定了保护青年妇女的法案，如在第九条法案《保护青年妇女条例》中规定：“禁止妇女参加革命者处罚。”在第十条法案《青年妇女要求纲要》中规定：“反对家婆打骂媳妇、反对老公打骂老婆、取消童养媳制度”^①等等。妇女们在法律上有了保障，从此，她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各项政治运动中，也敢于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1932 年 10 月经过选举，上才溪 53 个代表中，妇女为 16 个，下才溪 73 个代表中，妇女为 21 个。这些妇女参加政府工作后，积极向政府提出了关乎妇女利益的提案，要求政府颁布保护妇女的法令，恢复妇女在社会上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并督促政府、拥护政府、帮助政府工作。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也写道：“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他们都讨论，除了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等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②此外，她们还积极参加改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把苏维埃里面的腐化分子开除出去，把坚决勇敢的分子和青年领袖选到苏维埃工作，使苏维埃能真正成为领导群众斗争且有工作能力的政权。

^①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 4 辑，1983 年，第 220 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2 页。

通过对《上杭文史资料》中关于才溪乡经济、文化、政权建设等各方面资料的整理，发现才溪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是才溪人民在革命精神的激发下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的体现，不论是互助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创建，还是扩红运动的高涨、“儿童团”的建立、才溪妇女的勇气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都是才溪人民在创建中央苏区模范乡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农业合作化在泰宁

吴奕霖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泰宁是位于福建的革命老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和落后的封建剥削制度，一直以来，泰宁的农业发展都较为落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曾在泰宁试办过农业合作社，后由于货币剧烈贬值，政府支持不够，未进行彻底的触及所有制关系的土地改革而宣告流产。在新中国成立后，泰宁县政府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农业集体化进程，取得了粮食产量上升、农户抗风险能力增强、新技术应用情况增强等成果，但也存在为求多求快而工作过粗过急的问题。

关键词：泰宁；农业；合作化

泰宁地处福建西北，位于闽赣交界处。按最新统计，县域面积达 1540 平方公里。^①泰宁历史悠久，其建县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958 年。其建制虽多有改变，但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泰宁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传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曾经先后三次解放泰宁。除武装斗争之外，红军在占领泰宁期间，也曾带领当地居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等运动。泰宁也成为了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前线和重要补给基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泰宁沦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游击队和闽北独立师仍在此坚持斗争，1938 年 2 月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后，仍有闽西北游击队不时来到县境内打游击。直至 1950 年 2 月 9 日解放。^②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最主要的产业。新中国成立后，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宁是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县。建国初期，农业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对泰宁必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泰

^① 泰宁县政府：《泰宁概况》http://www.fjtn.gov.cn/mltn/tnxq/201512/t20151217_772961.htm

^②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泰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泰宁县历史沿革》，《泰宁文史资料》1-3 辑选编，1990，第 3 页。

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宣传、军事等情况进行了研究，^①但关注泰宁在农业合作化中进程的仍较少，尤其是在泰宁人眼中，如何看待农业集体化政策，成效又如何。基于此，本文将主要利用泰宁文史资料，探究泰宁人笔下是如何看待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泰宁的执行的，其效果又具体如何，从地方视角加深对农业集体化的认识。

一、泰宁农业发展情况

泰宁在民国时期，发展较为落后。红军建立的建泰黎苏区中，其发展也明显不如泰宁、黎川。农业是泰宁的支柱产业。在民国时期，泰宁虽也有零星工业，但农业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农业中，又以粮食生产占比最大。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原因，泰宁的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全县除沿河两岸的冲击平原上的早稻收割后尚能种些黄豆、油菜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一年一熟的晚稻田。且并没有精耕细作传统，反而多为粗放式耕作，在水稻成长过程中，一般仅施肥 1-2 次，甚至有的不施肥。^②这对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泰宁存在较为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普通农民生活更为艰难。而剥削的加剧，又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民对耕地采取粗放式耕作的方式，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了农产品亩产量低下的后果。据统计，泰宁县粮食平均亩产量仅为一百三四十斤。^③

从泰宁的土地占有形势上看，在建国前，除却公田外，主要有私田、族田、寺庙田三类。^④其中族田是以宗族为单位占有的土地。名义上是同宗族的共有，实则也是封建所有制。基本都掌握在士绅、地主手中。被当权者用来当作进行封建剥削和宗法统治的基础。在泰宁，这种情况尤为严重，此种形式占有的土地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48.6%。^⑤而寺庙田，则是以维持僧侣生活、寺庙香火等为名，以封建地租形式出租给缺地农民，实质仍是对农民的剥削。而所谓的私田，即以家

^① 刘新玲、邓雨霞：《中央苏区时期三明地区共青团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考察》，《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庞振宇：《闽浙赣苏区落实打通中央苏区战略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② 参见陈雄：《建国初期泰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1994，第 100 页。

^③ 据何邵钦《发展中的泰宁农业》（《泰宁文史资料》第 10 辑，第 41 页）一文所述，粮食亩产仅 68 公斤，合 136 斤；据陈雄《建国初期泰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00 页）一文所述，粮食平均亩产为 145 斤。

^④ 江天骅：《泰宁封建土地占有情况及剥削形式》，《泰宁文史资料》第 5 辑，1987，第 69 页。

^⑤ 江天骅：《泰宁封建土地占有情况及剥削形式》，《泰宁文史资料》第 5 辑，第 73 页。

庭为单位私人占有的田地，在土改前夕，占比仅 45.5%。而这其中又基本归地主、富农所有。平均每户地主所占面积比中农多 2.5 倍，比贫农多 7.8 倍。而中农、贫农合计 11869 户，地主、富农合计仅 523 户。^①中农、贫农数量是地主、富农的 22 倍多，从中可以看出泰宁此地土地兼并之严重。这对于农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大量底层民众，为维持生存，被迫通过向地主租取土地或是受地主雇佣等方式，受地主剥削。就最常见的向地主租土地自己进行种植这种形式来说，据 1942 年统计，佃农交纳租谷比例普遍在五成左右。若是受地主雇佣，进行农业生产而不直接租种土地，其收入也十分低。加之抗战爆发以来，物价不断上升。仅情况尚且不算十分严峻的 1939 年，其收入折合成大米计算，长工年工资仅折合为 681 斤 4 两。^②单靠这一收入，若想养活全家老小，显然是天方夜谭，因为这连必须的食物都难以满足。而由于农民缺少必要积蓄，抗风险能力差，而政府因自身财力及战乱等原因，要给予农民及时的援助或贷款也难以维系。因而，很多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等借高利贷救急，而动辄三分之一、五成的高额利息使得很多农民难以承受，最终破产，不得不受地主剥削。就是少数自身有一定土地的中农，也受限于政府高额的田赋，不堪重负。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以来，尤其在 1942 年下半年至 1943 年上半年，人民负担由每元二斗上升至四斗三斤，上涨一倍多，^③这对于农民的生活显然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民国政府并非没有试图改变泰宁农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也不乏创办农业合作社这一与之后新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有所相似的政策。在陈仪主政福建期间，主持的以“政、教、社”三位一体的新政中，其中重要的一环即为创办各类合作社，以试图复兴农村经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也为此培训了一批农村合作指导人员。其要求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在经济上进行自助和互助。期望能达到既不被人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目的。拒绝豪绅、商人等加入。1939 年，泰宁的基层社体系基本建立。截止 1943 年，基层社已经遍布除龙安地区外的全县。共有合作社 77 个，社员 3095 人，股金 6626 元。^④具备了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政府也将泰宁全

^① 江天骅：《泰宁封建土地占有情况及剥削形式》，《泰宁文史资料》第 5 辑，第 70-71 页。

^② 江天骅：《泰宁封建土地占有情况及剥削形式》，《泰宁文史资料》第 5 辑，第 75-76 页。

^③ 陈德基、戴长柏：《清末到民国时期泰宁田赋税制》，《泰宁文史资料》第 4 辑，1986，第 61 页。

^④ 陈祖宪：《民国时期泰宁农村合作事业盛衰的十五年（1934-1948）》，《泰宁文史资料》第 5 辑，第

县分成若干区，试图将各个区的基层社联合在一起，发挥各地的相对优势，建立区联社。可受限于资金不足、人手不够、指导人员流动性太强等原因，除炉峰联社外均告流产。炉峰联社业务也于 1944 年由其它商人接管。至于曾经雄心勃勃建立县联社的设想，更是天方夜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众呼声，执意发动内战。造成物价暴涨、货币剧烈贬值。加之主持合作指导员工作的陈祖宪，1946 年调离后，就没有人接任。解放战争爆发后，泰宁农业合作社业务迅速萎缩。在 1948 年，各级合作社都濒临瘫痪。不可否认，国民党在泰宁掀起的包含创立农业合作社在内的新政，对于发展泰宁农业经济以及农业集体化有一定作用。但由于负责人员流动性太强，政府控制能力差，基层执行力不强；资金有限，币值不稳，抗风险能力差；国民党政府不得人心，改革不触及土地所有权等核心问题，未把改革矛头指向地主等既得利益阶层，最终仍以失败告终，泰宁落后的农业生产面貌没有真正改变。

总体而言，在建国前，包括在土地改革前，泰宁的农业生产水平十分落后。无论是在农业生产技术还是生产所有制关系上，都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国民党时期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失败尝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在泰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

二、泰宁农业集体化的发展

泰宁在 1950 年 2 月 9 日解放之后，县委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进行了武装剿匪，开垦荒地，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等举措，度过了 1950 年的困难时期。在 1951 年，县委分批次完成了全县 56 个乡的土地改革工作，使得地主阶级剥削压榨贫苦农民的生产制度基础不复存在，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这解放了生产力，1951 年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长约 21%。这也为之后农业集体化的进行，从生产关系上奠定了良好基础。^①

195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在同年 12 月以草案的形式下发各地党委执行。提出“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

63 页。

^① 参见陈雄：《建国初期泰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1994，第 104 页。

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①不过泰宁早在 1951 年 4 月，泰宁县第一期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县委就在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介绍了河南李顺达互助组的先进经验。引导农民开展劳动互助。会后，在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城关、朱口、弋口 3 个区 16 个乡（街）的 4200 多户农户即响应政府号召，自发组织季节性临时互助组 520 多个，^②其规模无论是在参加人数上还是互助组个数上都已经超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经营近 10 年才达到的 1943 年的峰值。这是新中国人民政府深入人心，受到民众广泛拥护的一个体现；也反映了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分散经营对农业生产造成的阻碍。不过由于 1951 年县委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剩余 40 个乡的土地改革工作上，因而在春耕过后，大部分互助组即自行解散，仅有部分得以维持。这一时期是政府有限引导之下农民对互助组的自发探索。虽然其规范性上仍有所欠缺，但也帮助各地完成了春耕，是 1951 年农业得以增长的一个原因。其中能长期维持并取得相当成绩的先进典型也不在少数。如发展较好的城关区胜一街黄流贞互助组为例。通过集体开荒、上山砍柴、修筑鲤鱼坝、开挖水渠等措施，从而产量比单干时增加 9%，成效显著。儒坊乡江征瑶互助组在粮食丰收的基础上，还发展集体养猪，开办粉干厂一个，帮助参加合作组的农户大大提高了收入。^③这些自发形成，常年维持而非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有助于集中资金，汇聚成的公有财产可以兴修水利，改良农具，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应对恶劣天气等短期冲击，增强农户抗风险能力。这也为日后的农业互助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1951 年 12 月，伴随着泰宁土改的全面完成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下发，泰宁的农业集体化进程正式开始。1952 年 3 月，泰宁县委开始组织互助组，开展“组织起会，爱国增产”的以互助生产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同年 6 月，全县的互助组已有 1962 个，入组农户 10416 户，28075 人，占当时全县人数的 87.2%。^④互助组是去年农民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的近 4 倍，入组农户约是去年的 2.5 倍。这一时期的互助运动主要是靠行政手段维持的，存在工作过急，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52 页。

^② 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48 页。

^③ 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48-149 页。

^④ 陈祖蔚：《在合作化运动中》；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4、第 149 页

的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农民自愿，而将大批农户快速纳入合作社的情况，制度不健全的情况，造成了种种乱象。

具体而言，仅在 1952 年 6 月至 8 月，即有 490 个合作社解散。^①占形成合作社的四分之一以上。此外，在勉强维持的合作社当中，有的由贫农组织的合作社，其劳动力、资金、工具缺口都十分严重，难以互助；有的由较富裕中农结合而成的合作社，由于社员本身条件较好，工具、土地、劳力都较为充裕，故而合作社虽然形成了，但社员没有合作的动力，仍以个人为单位劳动；还有的是“吃空额”互助组，即区乡干部为向上级表示本地区合作化进程迅速而凭空编造的互助组，这类组，组员不认识组长，组长不认识组员，各类合作也就不可能开展，只具备一个空壳。还有的合作社人心涣散，时而互助时而单干，常常呈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情况，这与上级设立合作社的最初想法差距甚远。

出于纠正这些乱象的目的，县委派人赴各区乡检查情况。并进行分区培训骨干，举行了 3 期互助组长训练班，端正了各地区领导的思想，清退了一批流于形式的合作社。至 1952 年底，共有互助组 1472 个，其中常年互助组 155 个，入组农户 8167 户。^②规模虽较之前有所缩减，但由于端正了思想，这使得合作社的效率更高。在此基础上，县委根据省、地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精神，总结前一阶段优秀经验，在互助组发展较为成熟的弋口区儒坊乡，整合三个互助组，在 1953 年 2 月 11 日试点建立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房厝农业社。初级社在未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评股入社、提取红利的方式交由集体统一经营。这个由 19 户 78 人组成的合作社，整合了 245.65 亩土地、3 头耕牛、21 付犁在内的人员、土地、农具，在县委的领导及贷放资金和粮食的支持下，进行了合理密植、种植双季稻等试点。最终当年粮食增产 27.6%，还有两户实现了收入翻番的奇迹，展现了合作模式的优越性。按 1953 年县委办公室统计，该年除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单干户粮食增产率分别为 20.3%、13.8%、9.0%；这一数据无疑也使当时县委认为，合作化程度的深入会促进农业生产。^③

1953 年 9 月底，中央提出了过渡阶段总路线，其中提到了要逐步实现对农

^① 陈祖蔚：《在合作化运动中》，《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4 页。

^② 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50 页。

^③ 参见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50-152 页。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提出了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12月的决议中具体指出要“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①。受这些政策的鼓舞，泰宁的集体化进程也快速推进。县委快速推进初级社的建设。1954年春耕前后，即建立了14个初级社，每个社至少与8个互助组挂钩。^②依靠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战胜了当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取得了夏粮的丰收。在1954年底，规模更是迅速扩充到102个初级社。但这种迅速扩充的情况，显然并非完全是农民自发或具备条件的现象，很大程度还是基层干部贪大求多，忽视客观条件，盲目追求数量的结果。其中还存在对耕牛、农具折价不合理的问题。如上青社的一头牛病死后，卖肉所得的钱比折价款还高10余元；在弋口、音山等乡，还有农户将牛杀死或卖出后再入社的情况。^③加上粮食统购981万斤造成的农村缺粮问题，使得群众对集体化认同程度下降，生产积极性受挫，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1955年1月，中共中央要求对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即停、缩、放方针。泰宁县委也对前阶段突击办社的乱象进行整治，纠正了前一阶段折价不合理等问题。但由于1955年下半年，中央层面批判了所谓以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农业集体化迅速推进。泰宁也不例外，这之后，集体化走上了快车道。1955年即创办了13个高级社。至1956年2月底，已有63个高级社，入社农户5355户。1956年8月，县委合作生产部提出《关于秋前发展高级合作社的初步意见》，全县205个初级社全部扩编成为高级社，部分常年互助组和单干户也组建成初级社，甚至高级社。至1957年初，全县高级社226个，初级社17个，社员占全县农户的98.5%，基本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伴随着当年年底全县私有山林折价入社，历时6年的泰宁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暂告一段落。^④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0页。

^② 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16辑，第153页。

^③ 参见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16辑，第153-154页。

^④ 参见陈雄：《农业合作化运动》，《泰宁文史资料》第16辑，第155-157页。

五、泰宁农业合作化快速推进的原因及不足

相对于国民党时期农业合作化的推进缓慢，新中国成立以来泰宁农业合作化的进展无疑是十分迅速的。从1951年的一张白纸，到1957年就实现全县98.5%的农户加入初级社、高级社，这不可不谓是一个奇迹。

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政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迅速开始了政权建设，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政府对内剿灭土匪，保持货币币值相对稳定，进行土地改革，触及敏感区域，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以往土地大量集中于地主手中的情况。为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环境。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多年艰苦的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尤其作为革命老区的泰宁，对中国共产党也天然有更强的信任感。这是农业合作化得以高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农业合作化客观上增强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如应对1954年的洪涝灾害、1957年的秋旱^①等，同时也提升了农作物产量。1950-1957年，粮食产量平均年增长7%，这是化肥广泛应用、二季稻推广、兴修水利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都离不开集体化的作用。再次，是从典型入手。在集体化之初，泰宁县委在会议上就借用了河南李顺达互助组的先进经验，鼓励创立互助组。后来，也在泰宁当地塑造了包括江征瑶这一首先创立初级社的一批先进典型，这些人发挥的榜样作用，有助于其他人参与其中。再次之，是拥有一批经过系统培训的基层干部和工作者，除指导农民进行合作化之外，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会工作制度，从零开始培训了一批财会队伍，重在应用。^②同时领导干部作风优良，如1954年分管农村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赵起仓，双眼患眼疾，仍不顾劝阻坚持下乡；1957年时任县委组织部长常昌厚，常年在区里蹲点，深入基层，和村社一起劳动。^③这些官员的优良作风也会增加群众的认同感，从而使得群众更愿意配合集体化进程。

当然，由于中央的要求，以及地方工作中过于急躁、粗糙的问题，也不可否认，也存在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手段迅速推进的现象。如在高级社推进过程中，因办社十分注重阶级路线。在重新划定阶级后，新老上中农也暂缓入社。群众了解情况后，暂缓入社的都要求马上入社，甚至未批先办，有的单干户一步登天建

^① 参见江友金：《朱口光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泰宁文史资料》第16辑，第42页。

^② 参见廖珍珠：《农业社的财会工作》，《泰宁文史资料》第16辑，第54-59页。

^③ 杨孔修：《合作化时期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泰宁文史资料》第16辑，第46-49页。

立高级社，最终结果是流于形式。^①

^① 陈祖蔚：《在合作化运动中》，《泰宁文史资料》第16辑，第33页。

民国时期武平地区土匪社会关系问题研究

黄亦晴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民国时期，匪患问题成为中国的特殊社会现象。解放前的武平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封建割据势力十分猖獗，各路土匪占山为王，割据一方。武平土匪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深刻影响着土匪的身份流转、政治倾向、谋生行动和势力起落，是研究土匪活动由生成至覆灭过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只有厘清土匪在民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下与军队武装、国共两党、当地民众以及其他土匪间约定俗成的关系，才能窥探土匪是如何利用社会矛盾，在复杂的环境中夹缝求生，进而还原民国时期武平土匪的社会生活，透析土匪的生存哲学。

关键词：土匪；武平地区；社会关系

中国的匪患问题古来皆有。民国时期，土匪因其人数多、影响大、分布广、武装水准高，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其中，边界地区由于政府管辖能力较弱，极易受到绵延不绝的土匪活动的侵扰。若是再加上处于群山或森林地区，那么“非法活动的范围甚至还会进一步扩大”。^①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山高林密，峰回路转，交通闭塞。因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域关系，民国时期武平地方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为匪徒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土匪们打家劫舍、为害一方，流窜于三省边界，给武平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危害。土匪生活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深刻影响着土匪的生成、行动与最终结局，只有厘清土匪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立体重现土匪的社会生活，理解民国时期的武平土匪是如何利用社会矛盾，在复杂的环境中夹缝求生。

^① [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一、身份流转：土匪与军队、地方武装的关系

民国时期武平地区的土匪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与国民党关系颇深的、国民党有组织地布置留下的政治性土匪；二是以封建恶霸为主体的地方实力派所领导的地方土匪武装，拥有大量的家产田地，凭借财力和武力在当地横行霸道。此外还有少数惯匪，以及一些无业游民、流氓和部分专以抢劫谋生的职业土匪。^①其中，大多数土匪的发迹与军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有着深厚的关系。

军队是土匪转变身份的重要中介。常理而言，军队的作用主要是为保障社会治安，负有防止盗匪侵扰的责任，故军队与土匪一般是处于剿伐与被剿伐的对立地位。但在民国时期，军队与土匪的关系竟然实现了共存共荣：在一定的条件下，兵可以转而为匪，匪也可以升格为穿军装的“官军”。^②民国时期，各地军阀为巩固已占领地盘不惜招匪为兵，此举可在短时间内聚集成军，同时获得人员和枪支。武平匪首总代表钟绍葵正是通过被军阀收编，完成了从土匪向军官的身份转变。钟绍葵于1932年投靠广东军阀陈济棠，其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新编独立第一旅，钟绍葵任旅长，成为割据闽西的主要势力。此后钟绍葵部先后被改编为“闽西剿匪第一支队”、“闽西游击第一支队”，再被驻长汀福建省保安处处长萧乾改编为福建省保安十四团，钟任团长。在此过程中，钟绍葵多次率部进攻武北、武西苏区，攻打工农武装，给苏区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因其反动活动俘获瞿秋白“有功”，1937年钟绍葵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并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被授予“中正剑”和陆军少将军衔。^③武平解放后，亦有许多残匪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反动组织“反共救国军”和“中国人民自由军”中，从土匪摇身一变为“司令”。这些土匪即使成了转换身份成了军官，依旧匪性难改，招抚和收编反而导致土匪的掳掠恶行更为合法化，加剧了匪患危害。另一种身份转变则是由士兵变为土匪。由兵为匪的过程主要有两种：被遣散为匪或是因军队哗变逃窜为匪。由于民国时期战争四起，农村经济凋敝，许多被遣散的士兵为谋生成为土匪。一些流为匪的兵带有枪械，加上通操法富见识，成为匪中骨干。^④潘顺荣是武平县四十年代前期的有名匪首。1934年冬，潘顺荣在武平县保安队（后改常备队）任分队长，后队长修园被暗杀，当局怀疑是潘顺荣所干，将其免

^① 阮文炳：《红旗下的决斗——忆二五九团在闽西剿匪（上）》，《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7期。

^② 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③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5-7页。

^④ 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职遣退。潘顺荣回家后纠集 10 余歹徒上山为匪，经常在筠门岭、罗塘、三子脑、乌鸦泊等地抢劫。1937 年潘顺荣被编入武平保安队，在负责护送伤员中途将伤员害死，再次被驱逐出队。潘顺荣被驱逐后重操旧业，在闽粤赣边境抢劫商旅，扩大武装，图谋报复，后其势力发展到百余人，超过当时武平各县乡镇公所后备队的武力，成为为害一方的匪首恶霸。^①

地方武装是土匪运行协调的组织形式。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在武平各地作威作福的土匪头目有一最大的共同点：其发迹是由于获得了枪支弹药。无论最初是抢劫、借枪还是通过手段从军队中获得枪支，凭借武力恐吓土匪们能够较为轻松地纠集帮派，组建土匪武装，主宰地方，“武平派系林立，武装三五成群，集结为股，互相残杀，为患全县”^②正说明了这一特点。当时的地方土匪武装团伙主要是小股土匪，即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上拉起杆子，集聚数十人通过结拜结成匪帮，在较小的地区范围内进行抢劫活动，虽规模不大但组织灵活、门槛较低，在当地十分猖獗，成为武平土匪日常活动的主要组织领导形式。这些地方土匪武装多背靠当地颇有实力的封建恶霸，如大地主大土豪或大匪首及其残部等。武平孔厦大地主吴增华在收租放债外的同时着力购买枪支，积极组织地主武装，扩充势力^③；在钟绍葵到南京中央军校后，有的钟绍葵旧部就回到武平“拉起杆子”来成为地方大小股匪，点燃了武平匪患的火种，严重威胁着当地的治安。地方土匪武装团伙增多，枪械数量随之剧增，不同势力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就各自动用武装进行械斗，严重破坏了武平的生产力。

二、政治倾向：土匪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一）与共产党：激烈反抗、投机革命

由于不少土匪与反动地主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土匪们的意识形态十分固化，因此他们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革命往往采取激烈对抗的政治倾向。民国时期，武平著名匪首大多曾参与围剿红军和赤卫队，摧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屠杀革命志士。岩前匪首在钟文才称霸和平乡时，曾组织所谓“保商队”，压榨人民，积极反共。1930 年 6 月，红四军主力从寻邬剑溪越过闽赣边境进入和平岭下时，

^①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 年，第 18-20 页。

^②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 年，第 54 页。

^③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 年，第 50 页。

“保商队”在溪头墟神坛角试图阻击红四军先头部队。后钟文才部在溪头墟抓了两个人，认为其是赤卫队的探子，将其捆绑后用刺刀刺倒于河滩上，复用屠刀乱斩致死。^①武平县大禾乡坪坑村人潘美庆于1933年联合山头村潘姓宗族攻打工农红军，此后又陆续打死红军十余人。后红军攻破其土楼，潘美庆逃窜投奔广东军阀旅长严应鱼。1934年2月，潘美庆回到大禾乡成立“武北反共后备中队”，与湘店的刘绍光、孔厦的吴增华、小澜的张松昌、邓坑头的邓启荣、桃溪的王佐才等人各霸一方，屠杀苏区干部。潘美庆在坪坑先后杀害乡苏主席熊添贵和熊添贵的妻子，又将熊添贵的儿子卖掉以换取钱财。其他革命群众则有钱的罚钱，无钱的罚工。一名叫潘有老细满的赤卫队骨干，全部家产都被抢光，在避难途中被潘美庆的爪牙捉回，一家三口人均被残害致死。^②小澜匪首张松昌亦有激烈的反共罪行。张松昌曾在钟绍葵手下当兵，协助钟部先后四次围剿小澜苏区，屠杀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烧毁村庄十座，民房四百余间。^③

由于土匪极其重视个人利益，心智和政治立场不坚定且易受挑唆，一些土匪在认为支持中共革命有利可图时会支持革命，眼见革命形式不利时会立刻叛变革命，转为反革命的一方。潘顺荣和廖歧鸣就是土匪投机革命的代表性案例。毛泽东率红四军入武平期间，潘顺荣曾任上峰村赤卫队班长。待红军撤离武平、钟绍葵等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后，潘顺荣立刻叛变革命，在钟绍葵部下当兵。1932年，中央红军再次进入武平，协助武平全县普遍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潘顺荣又投机革命，并担任武西游击队队长，在协助区、乡苏维埃清匪反霸方面做过工作。1934年10月，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潘顺荣再次叛变革命，彻底同中共革命站在了对立面。1949年5月22日，练惕生、傅柏翠、李汉冲在上杭向毛泽东通电起义，宣布闽西各县脱离蒋介石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后，永平乡人廖歧鸣曾作为武平县永平乡支会主任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后廖歧鸣在国民党杨炯部截获数支枪，但因其爱枪如命，不肯听从交出枪支的命令，又受到吴增华等匪首的拉拢和怂恿，廖歧鸣叛变革命，加入了反革命武装。^④

这些激烈反抗革命和立场摇摆不定的土匪对中共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让他们极为排斥“异端思想”，另一方面又极容易受

^①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16-17页。

^②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39-41页。

^③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37页。

^④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44-46页。

到国民党的挑唆和地主豪绅的鼓动，反抗和背叛革命。这些土匪不仅苏维埃时期多次骚扰武平各县的中央苏区、残杀工农工部和广大进步群众，武平解放后依然虎视眈眈意图反扑，在不同时期均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严重阻碍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

（二）与国民党：兵匪互通，沆瀣一气

民国时期，兵匪相通是土匪与国民党关系的最鲜明的特点。土匪倒向国民党一方后，能够获得官位、扩大势力，成为了表面上是军队，实际上和土匪并无区别的“兵匪”，而国民党军阀也通过和土匪互通的方式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土匪依附于国民党，寻求国民党军官的庇佑。如在钟绍葵扩大势力的过程中，曾收到割据广东的粤军捐助的三百多支枪，于是钟绍葵前往广东投奔广东军阀陈济棠，得以占有汀、杭、武、永四县相当一部分地盘，达到发迹的顶峰。此后，钟绍葵常率所部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围剿”红军，也常独自骚扰苏区，袭击我工农地方武装。在与红军的交战中落败后，钟绍葵在逃窜过程中不停寻找新的依附对象。钟绍葵在广东不敌红军攻势后，1933 年前往上杭投奔广东军阀黄任寰；黄任寰撤回广东后，钟绍葵又依附于投国民党十九路军沈光汉；后沈光汉于福建事变中阵亡，钟绍葵又改投驻长汀省保安处处长肖乾。^①可以见得，只靠单纯的土匪活动，钟绍葵既无法保障自己性命无忧，也断然无法达到后来的地位，他只能不停的转投和依附国民党军官，以求人身安全和荣华富贵。国民党给予土匪一定的庇护，是为利用土匪进行反革命活动。1933 年，广东军阀旅严应鱼曾进驻武平，企图围剿苏区红军。潘美庆由于被红军攻破，与大禾村的蓝启观、邓坑村的邓立文等人共同投奔严应鱼，成为国民党阵营内的反共干将，到处攻打武平县苏区。^②直到解放初武平县的反革命活动仍很猖獗，从台湾派回的国民党匪特唐宗潜踪于闽西，积极搜罗闽西反动势力，与武平各地残匪沆瀣一气，骚扰新生的政权，意图使武平的封建势力死灰复燃。

但这种依附和利用关系无疑是十分脆弱的，当涉及到利益相关问题，双方的联结会不攻自破。出于自身利益，国民党军官会毫不手软地处决掉土匪。严应鱼驻守武平时，和平乡正深受钟文才和潘满三等土匪的侵害，有几名被潘满三勒索

^①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 年，第 5-6 页。

^②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 年，第 39 页。

过的富户贿通严应鱼要求为其报复，严应鱼就立刻设计除去了钟文才和潘满三^①；完成身份转换的钟绍葵则是死于和黄苏的国民党政治内斗中。而土匪在称霸其地盘后，由于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国民党的掌控。如1933年《红色中华》就曾报道武平东留乡团匪叛变，杀死国民党军官三名，国民党不得不紧急调兵镇压。^②1947年潘美庆在长汀濯田因私人恩怨捉了几名林姓人，林姓人家属向国民党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告状后，专署派县政府来解决此事。潘美庆得知后竟让人威胁县长“我的事情不要他管”。后专署派陈余珊前往潘美庆处问罪，碰巧陈余珊接到紧急命令，未进坪坑就回师走了，使得潘美庆的更为嚣张气焰。^③土匪和国民党军官间的合作关系也会在旦夕之间发生转变，1949年国民党胡璉兵团残部入武平县后，曾拉拢东留乡匪首王乃文作为爪牙。然而胡璉率部南逃、杨炯部来武平县后，不仅缴了王乃文的枪，还将其投入监狱。^④

英国学者贝飞思认为土匪“情愿选择较为省心省力而且似乎又有比较多报酬的出路而充当反动势力的爪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土匪在‘剿匪’的名义下，以骇人听闻的热情镇压威胁他们新地位的人——尤其是革命者。”^⑤民国时期武平县土匪在客观上具有反社会性，由于目光短浅，加之和地主恶霸等封建地方势力相勾结，这些土匪更愿意接受在当时占据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的招抚，积极协助国民党进行反动活动、欺压人民和破坏中共革命，其在政治上的反革命性和反人民性与国民党是一致的。不过，武平的土匪大多并没有十分坚定的政治目标，对他们来说，促使其做出选择的往往是权力的诱惑和利益的权衡，而不是政治立场。无论是与共产党还是在与国民党接触，土匪们总是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会在一定阶段积极合作，也会毫不犹豫地叛变倒戈。

三、谋生活动：土匪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一）为非作歹，草菅人命

在土匪活动中，暴力和残忍是家常便饭。如果土匪的暴力活动有特征，那就是土匪往往会将暴力指向毫无还手之力的普通民众，并通过暴力手段积累不义之

^①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17页。

^② 《武平东留团匪百余人叛变：杀死反动长官三名》，《红色中华》1933年2月25日。

^③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43-44页。

^④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52页。

^⑤ [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8页。

财，不断扩大势力，最终武断乡曲、鱼肉平民。

土匪的最大恶行是草菅人命、残杀无辜群众。土匪杀人的理由五花八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有可能使普通民众招致杀身之祸。潘美庆称霸大禾乡期间曾带一行人到江西会昌打家劫舍，将朱村村民钟同发一家五口折磨致死^①；大禾乡另一土匪林隆仁，仗着有潘美庆做靠山，不仅为图钱财杀了一名逃壮丁住在他家的城关人，还为报复第四区区长廖步蟾，开枪打死其弟廖永龄^②；曾经有个上杭人到中堡讨债，不仅钱被中堡土匪石启三勒索去，人也被活活打死。石启三还将外地来的参茸商贩强行抓捕，搜刮其货物和钱款后将人杀死。^③除了普通百姓，许多土匪甚至还将魔爪伸向家族内部，引发激烈的房派斗争。中赤乡土匪童铭性格多疑，只因嫉妒他人文化程度高，或是疑神疑鬼担心有人意图加害自己，便毫无根据地将大房和二房的数名童姓人士杀害^④；大禾乡土匪钟富洋得了枪支后，肆无忌惮地欺辱和残杀弱房，向弱房借钱借谷、霸占田地，一旦弱房稍有反抗就将其击毙，十余家弱房中有七家被其杀绝。^⑤

虽然有部分土匪受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观念影响，未曾欺辱妇女，但仍有大多土匪曾做出蹂躏妇女的恶事，特别是当地匪首是好色之徒时，更会纵容手下欺辱妇女，严重影响当地妇女的日常生活。钟文才及其部下官兵经常捉拿妇女，调戏奸淫，平时无事就在和平乡福元寺附近的建安亭处等着，见到貌美妇女经过时就拦留茶亭里欺辱，害得四邻妇女纷纷哀叹“插翅难逃建安亭”，甚至将一些妇女霸占为妻不让她再回夫家。^⑥石启三更是强捉妇女后“玩够了”就将其卖掉以获取巨款。石启三曾将上杭一妇女捉去后卖给他人作妻子，而受害者原来的丈夫一听是石启三所为，不敢与其交涉，只能作罢。^⑦

上述惨无人道的恶行，其结果是加深了当地民众对土匪恶霸的恐惧。土匪的侵扰严重威胁着人们的人身安全，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惧愤交加却无力反抗，以至于1950年二五九团开进武平剿匪之时，百姓由于恐惧匪首的罪行，担心遭到土匪报复，几乎无人敢给剿匪队带路，甚至有不少人被迫为土匪通风报信，

^①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40-41页。

^②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47-48页。

^③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28页。

^④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24-25页。

^⑤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31页。

^⑥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16页。

^⑦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28-29页。

导致剿匪工作的展开一度陷入瓶颈。

（二）暴力抢劫，绑架勒索

由于土匪脱离生产，暴力抢劫和勒索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①土匪维生的主要活动是劫掠那些没有防卫能力的穷人，抢劫的方式和规模则随土匪自身力量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武平土匪往往先从抢劫个人农户、抢劫商店、在交通线上袭击过路人等行为开始其犯罪生涯，通过抢劫积攒财力和火力，不断扩大武装。如桃溪村土匪王佐才在窃走了他人的枪支后纠集歹徒十余人抢劫桃溪码头上的百货商店，抢走该店老板护店的枪支以及店里的所有财物。^②东留乡的王乃文则每年会选择一、二次最多人往江西买牛的时机，派亲信到江西境内的山子脑以西的地方，埋伏于荆棘丛中，用麻布遮住头面出来抢劫路过的牛贩，据说最少可得银元万元以上。^③另一种抢夺钱财的方式虽不如拦路抢劫一般直接，但与明目张胆地抢劫并无本质区别，即发“乌单”。潘顺荣会在“乌单”上写明某某应交大洋若干元，限某月某日某时送交某地等语句，到了缴款日则有武装人员于收款处等候，缴清的在他的簿上记上姓名及款额，不给收据。即便这些“乌单”上没有写明发单人的信息，但当地人都明白是潘顺荣发来的，无人敢抗缴。^④石启三、廖歧鸣等匪在伏法前也经常发“乌单”勒索较富裕的人家，有迟迟不交的人则将其打死，或将其孩子抓去杀死。得到“乌单”的户主如交款则有济匪之罪，如不交款则可能被土匪打死，许多只能被迫迁往外地避难。

绑架勒索是土匪谋生活动中最为便利实用的方法。与单纯的抢劫相比，绑架勒索有三个明显的好处：首先，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风险较小；其次，抢劫而来的赃物较难处置，而被绑票者的家人大多会尽力赎出受害者；最后，被绑者移动较为方便，在匪帮迁徙时易于带走。^⑤武平民间有一种说法叫“捉羊牯”，意为捉人后逼被捉者亲笔写信给家属，限期秘密拿钱交至某地后始得释放回家，土匪可借此勒索巨款，充饱私囊。“捉羊牯”是武平匪首在短时间内大量获取钱财的重要途径之一，如王乃文经常指派队兵化装为匪到各村甚至江西境内“捉羊牯”。据东留乡村民说，王乃文写出的字条就是纸票，可以凭条向某某人

^①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②《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40页。

^③《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50页。

^④《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24-25页。

^⑤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付钱。^①民主乡匪首钟腾福经常派人到邻近各村，甚至到广东平远和江西边境捉“捉羊牯”，中山的洪昌发店老板就曾被钟腾福捉过，付出巨款后才被释放回家。

②

除了抢劫和绑架，许多土匪会通过私设关卡、征收税款的不正当方法索取钱财。1929-1931年间，岩前匪首钟文才组织所谓“保商队”占据和平乡时，分别在和平到下坝、和平往江西罗塘的交通要道上设卡收税，有岭下、神塘角和碌头塘等几处收税点，凡过往货物如食盐、大米等均要交税，百货、布匹、鸡鸭等更是视其价值临时决定税额，由于货运进出量大，来往商旅多，收税数字甚为惊人。

③在武平到岩前的公路未开通前，中赤乡土匪童铭见中赤到下坝和中赤到岩前的水陆两路货运频繁，便巧立名目派兵设卡，征收“护河税”和“护路税”，将大量钱财充入私人腰包。^④潘顺荣在中山兼任“示范乡长”时，从中山往东留的中途设关卡收“护路费”，又于中山往下坝的中途设卡收费。每逢中山墟期，还要在卖牛之地征收牛纲税，即成交之后每头牛均要收税。这三种税收，每年可达万元左右。^⑤

上述活动之外，土匪还会通过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贩卖鸦片、走私枪支弹药及其他违禁物品等谋利。土匪还会通过“赢得输不得”的赌博获取钱财，如石启三在自己开设的赌场内赌输时，就让部下开枪制造混乱，石启三再乘赌博者吓得逃跑时把赌桌上的钱全部收入囊中，从乱中得利。^⑥对于土匪变着法子压榨人民、牟取暴利的行径，民众无力抵抗，只能逆来顺受，为了保命任由土匪欺凌。

四、势力起落：土匪与其他土匪的关系

（一）内部火并，彼此残杀

武平土匪大多数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主要活动区域，为了各自的利益经常彼此残杀。对匪首而言，他们必须时刻防备与其他势力土匪之间的火并，因为他们随时有遭杀身之祸的危险。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钟绍葵死后，其旧部散居武平各地，霸占一方，构成的两大对立的武装营垒，即以钟绍葵之兄钟福兰为首的岩前

^①《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51页。

^②《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19页。

^③《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14-15页。

^④《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26页。

^⑤《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25页。

^⑥《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29页。

派和以潘顺荣为首的中山派。起初，岩前派的武装势力强，后来岩前派的钟冠豪带钟绍葵旧部数百人前往广东，留在岩前的只剩钟绍葵的亲属钟福兰、钟国桢、钟勇等数十人；而中山派却由弱转强，潘顺荣步步高升期间，与岩前派不合作的钟绍葵旧部如钟隆、钟治才、童铭等都带枪投靠潘顺荣；武西一带的股匪潘满三和钟腾福等倚仗潘顺荣的权势，也携枪前来投奔。鉴于双方武装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山派计划谋杀钟绍葵家属并歼灭余党，占领岩前。1942年8月，由钟隆、钟治才带领百余名短枪士兵，从中山出发抵达钟福兰家，击毙了钟福兰和钟绍葵之子钟国桢。几日后中山派又纠集人员，由钟在东率领，意图袭击钟绍葵义子钟国勋，但被其逃脱。1943年钟勇击毙钟在东并承认这是“报私仇”。^①潘顺荣死后，钟国勋协助围剿了潘顺荣残部，之后武平土匪被缩编为两个中队，岩前中队中队长为钟勇，城关中队中队长为陈荣辉。虽然两派曾经的头目均已离世，但争斗埋下的相互敌视的种子依然存在：1947年，钟隆的婶婶去世后葬在钟绍葵附近，钟国勋对此十分愤怒，与钟勇一同借机击毙了钟隆。^②由于地区势力网络纷繁复杂，权势较大的匪首之间的关系也会在双方部下间的关系中得到反映，如钟勇和钟在东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使得武平县和平乡各村都有占村为王的小头目。其中，流芳村的钟善根父子依附当时的乡长林扬波，而林扬波又以钟勇为主子；钟腾福则以钟在东为主子。钟勇和钟在东间的仇恨导致钟腾福和林扬波成了死对头，双方以某座木桥为界，桥以北为钟腾福的势力范围，桥以南为林扬波的势力，人称“和平乡不和平”。^③

（二）利聚而来，利尽则散

土匪与其他土匪之间并非只会相互敌视火并，面对共同利益也会结成统一战线，但这种出于利益而结成的同盟也极易因为利益关系分配不均而不攻自破。武平县湘店乡三大地头蛇刘光绍、刘佳模和刘炳光为培植家乡势力相互勾结，仗着三人在区署和店厦联保处的任职流逢一气。然而没过多久，刘佳模和刘光绍因刘光绍旧识林炳光的运米船能否免税放行一事产生嫌隙，刘光绍决意铲除刘佳模并取而代之，并纠集人员攻打店厦联保处，赶走其余二刘，自封为联保处主任，肆意掠取钱财。^④三人原本“桃园三结义”的关系就此破裂。

^①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35页。

^②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37页。

^③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19-20页。

^④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七辑》，1986年，第33-35页。

在和其他土匪存在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即使是相看两厌的匪首们也会暂时联合，以面对共同的敌人。由于中共革命触及到了武平的封建根基，顽固不化、匪性难改的土匪们将中共视为共同的敌人，这一特点在武平匪患即将覆灭之际尤为明显。武平县城于1949年10月17日解放，但反革命分子仍然潜伏于暗处随时准备反扑。中正区（现为武东镇）人民政府成立后，石启三、吴增华、廖歧鸣等匪首与暗藏在政府内的反革命分子林正元勾结，纠集匪徒共二百余人，携机枪等长短武器于1949年10月25日夜晚突袭政府，数名政府人员牺牲，新生的中正区人民政府亦被捣毁。^①此外，被编入由国民党匪特唐宗成立的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武平残匪林国梁、王乃文、童铭、廖歧鸣、钟锡成等，也仍然顽固地抵抗中共革命。1950年，这帮残匪趁县城兵力较为薄弱之时，秘密部署，集中力量偷袭县城，并计划林国梁部由十方挺进东门，王乃文部由东留向西门接近，廖歧鸣部由永平进袭北门，钟锡成部则向城内突击，袭击县政府、监狱和公安局。3月21日晚，钟锡成率领三四十人分四路袭击县城，但行动未果，仓皇逃跑。王乃文、廖歧鸣等察觉袭城失败，各自散去。^②实际上，夜袭县城的匪徒虽多，实施行动的只钟锡成一股。各匪股之间长期以来宿仇甚深，虽一时为形势所逼而拧成一股，但彼此间仍相互猜忌。由于钟勇和钟锡成原就不对付，钟勇故意指派钟锡成打头阵，希望借刀杀人。袭城行动失败后，土匪间矛盾进一步尖锐。在中共剿匪主力部队二五九团和全县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军事压力和瓦解政策下，童铭、廖歧鸣、王乃文等先后被剿灭，所谓“反共救国军第十四纵队”烟消云散。

^①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59页。

^② 《武平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1985年，第60-63页。

革命记忆中的连城青年

万怡情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福建省连城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涌现出了一批批热血青年在各个时期积极投入革命。本文聚焦连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黄埔军校学生、苏区游击队队员，展现了连城人从学生、进步青年到革命者的革命历程。根据《连城文史资料》对该群体的叙述，解读文史资料的叙事逻辑进而探索连城人民红色记忆中的青年形象和革命认知。

关键词：青年群体 苏区革命 连城

青年群体是一个近代中国革命和复兴的中坚力量。连城进步青年也在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或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见证者，或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的参与者，或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大业的推动者。然近代革命风云诡谲，连城青年在身份特征、道路选择、人生走向上各有异同。这是连城人民对于进步青年的红色记忆，也是作为先锋的青年学生群体之心灵史、生命史紧密交融的综合场域。

一、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在连城

在二十世纪初叶，国内一大批先进的青年学生，以改造中国的鸿鹄大志，不辞风浪，联袂赴法，去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这股潮流迅速波及福建，甚至连偏僻的连城也很快开展了起来。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会对连城青年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连城人民又是如何让看待这些有志青年的呢？1919年兴起的闽西南地区赴法勤工俭学活动，通过当时“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指令所管辖“闽南护法区”即闽西南地区每县各选派青年学生二至三名，以半官费的形式（每人每年大洋三百元）赴法俭学的。据吴曦先生回忆，连城共有吴曦、吴乃青、吴树钧、罗际青、黄永源、黄翼深、黄鸣谦七人赴法勤工俭学。

（一）一意孤行、不畏艰辛的叛逆青年

在连城这交通闭塞的小县城，足迹不过里门，远离故乡无疑要莫大的勇气。尽管父母亲戚不赞成，认为“飘洋过海，远适番邦，十分危险”^①，但青年们为了追求理想，远走他乡。他们排除万难，一心求学，最终得以成行。与连城青年同船的还有湖南师范学校的校长徐特立和蔡和森、蔡畅、徐树屏等人，历时三个多月最终抵达法国。吴曦先生多次提到“艰辛”“不易”等词，这大概是对留法最深刻的记忆。留法勤工俭学的艰难首先体现在物质匮乏，经费短缺。闽西各县是根据各县书院可提供补助的财力确定名额的。当时长汀送 6 名，连城送 4 名^②。每个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每年规定可得 300 元大洋的补贴，但这种待遇只能享受 6 年，“那时银的价格很不稳定，多时一块大洋可兑换十五个银法郎，少时只能兑七个银法郎。”^③每个留学生在法国每年要 500 元光洋的费用。不够部份只得由家里补助，否则就无法在法国继续学习下去。

（二）信仰各异的知识青年

连城青年热衷于接受各式各样的新思想、新理论。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留法同学间思想自由，各自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贾凯将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有一定信仰或倾向者，如周恩来、蔡和森信仰共产主义；第二类是或多或少受到各种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但没有明确信仰或倾向者；第三类是赴法勤工俭学花费较少且能“出洋”，所以才选择赴法的青年学生。^④除极个别外大多都是无党派的，连城青年中有的主张实业救国，有的认为教育救国，“我深信唯有研究科学才能救国”。船上有同学分发李石曾译介的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在此过程中不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吴曦与同学曾游历柏林、波茨坦、日内瓦、萨瓦省、格勒诺市等地，见证马克币飞速贬值，“短短两个月，货币面额从最高一千膨胀到一兆（万万万）”^⑤。据吴曦先生回忆，黄翼深学化学，罗际青在造纸学院学造纸，吴树均学美术。部分学子有很好的英文、法文基础，赴法直接入学。黄永源毕业于长

^①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09，第 54 页。

^② 宣和乡占三名，当时宣和乡属长汀管辖，现归连城县管辖。因此连城一共有七人。

^③ 《连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09，第 64 页。

^④ 贾凯，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若干问题再探讨——与《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一文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19(08)：第 116-122 页。

^⑤ 《连城文史资料》第十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09，第 15 页。

汀教会学校还曾任连城旧址中学英语教员，有扎实的英文功底，到法后直接入巴黎大学学文科。吴乃青从小聪明、学业优秀，“入巴黎大学学政治经济”和周恩来先后班。而吴曦和黄鸣谦“先花了两年时间打好法文底子”。1922年秋考取了法国林尼大学，修读了数学、理论物理学、理论力学等课程。后来又进了巴黎大学学习普通物理学、应用力学和概率学，获得了林尼和巴黎大学的双文凭。吴曦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为了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和经费，他努力考取了“庚子赔款”^①。“整个闽西、闽南留法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有此幸运”可见其学业优秀和求学的艰难。吴曦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又在机电学校、里昂中央工学院和巴黎电工学院学习六年，取得了机电、电机、无线电工程师的资格。

（三）命运多舛的清高才俊

连城青年抵法后不久，法郎迅速升值。国内本可以维持半年的补助只能维持三个月的生活费，这让原本就不易的留学生活雪上加霜。许多学子因贫穷，学业被迫中断，加之时局动荡留法生存难以为继。黄永源家庭贫苦，除了国内补助外，一直在旅社饭店靠擦皮鞋交学费。法郎的升值使得生存愈发艰难，他耻于向他人求援，在法同学也自顾不暇，穷困潦倒最终自杀于塞纳河。听闻死讯，“我们都很惋惜”。吴树钧未回国，“已五十年没有音讯”，大概是“希特勒进攻法国时死了”^②。1926年适逢北伐浪潮高涨，吴乃青、黄冀深、黄鸣谦、罗际青满怀救国热情回国。部分学子回国后生不逢时，怀才难遇，在贫病交困中死去。之后吴乃青却因对国民党不满，多次入狱。吴乃青思想进步，但自视甚高好批评时政，多次入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终其潦倒一生。吴树钧所学美术，不被时局重视，后下落不明。曾庆宗因新闻学难有所用，加之在德劳动过度，不久也因贫病交加而死。赖寿仁回国后不久也因肺病去世。其他人大多在动荡的年代杳无音讯、下落不明。生在乱世如飘萍。他们许多人并没能再回到家乡。

（四）实业救国、兢兢业业的实干者

部分连城学子在风雨飘摇中始终顽强坚守。待到时局稳定后毅然回国奔赴祖国大江南北，在各个部门担任重要岗位，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发展作贡献。吴曦毕

^① 考取庚子赔款：在中国“庚子赔款”后，美、英、法、荷、比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超过实际损失的赔款。退还款项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中国每年向上述国家输送相应的留学生，庚款留学生由此产生。

^② 《连城文史资料》第1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09，第64页。

业后被法国通用和无线电公司录用，月薪 1300 银法郎。“但是祖国在召唤我，我要用我学到的知识为祖国的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服务”^①，于是在 1931 年回国。吴墩回国后，在邮电系统工作三十五年。初任南京国际电台工程师两年，接着十年间辗转重庆、新疆、广州、西藏多地的交通部门任职。1937 年七七事变时，吴墩和同志们连夜将设备转移至临时发讯台，维护电讯的正常运转。抗战期间参与重庆电信局发讯台的建设工作，主要负责安装用作备战的英国马可尼公司发讯机和防空洞电源设备，险些惨死在重庆大隧道防空洞惨案事件中。之后又调往新疆负责沟通乌鲁木齐到苏联的通讯工作。范启煌在法学医八年，回国后在上海成立医院救死扶伤，颇有声誉。黄翼深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明耻中学、漳州职业中学、连南中学校长，培育了很多人才。忆起留法同学和岁月，吴墩感慨道：“勤工俭学真不易啊！黄永源自杀了，赖寿仁、曾庆仁也被沉重的劳动压垮死了，吴树钧流落凄凉的死亡了”“算我幸运，回国工作三十五年，对祖国实业发展略有贡献，素志能酬。”^②

留法勤工俭学生有着复杂多重面相。多数勤工俭学生陷入失业、失学的困境，部分青年甚至绝望自杀。但同时，留法青年作为革命者，引发了二八运动、拒款运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大规模革命活动，其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对后来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连城人心目中，留法勤工俭学青年是一群一意孤行的叛逆少年，是怀抱救亡图存理想的爱国志士，是兢兢业业建设祖国的实干者。

二、连城籍黄埔军校毕业生

五四运动不仅激励了连城青年飘洋过海，远赴异域探寻科学和救国的真理，革命的浪潮从没停歇，连城青年也从未停下振兴中华抵御外敌的脚步。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为北伐积攒军事力量。连城青年纷纷赴粤报考黄埔军校，包括李修兴、罗列、江道谦、罗庆梁、罗镇粤、李云贵、江斗山、江连钦、吴振光、童懋山等数十人，为北伐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输送了一批军事和政治人才。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连城文史资料 第 11 辑，1989.09，第 65 页。

^②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1983.11，第 55 页。

连城县黄埔军校毕业生名单如下^①：

吴振刚	卢志新	陈长连	罗庆梁	林祖康	张汉华	李振声	罗汝正
李修兴	张履雄	邓启群	吴承熹	张履馥	江震岳	江斗山	江连钦
卢荣光	张履勳	罗先志	罗廷徐	张如桂	钱盛醇	李云贵	童懋山
罗列	陈永阳	罗镇粤	林中烈	张良	张同古	江道谦	江毅
周冠芸	黄蔚南	罗永汉	林震东	胡济南	李济时	陈永南	

（一）中小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

黄埔军校的招生对象是高小毕业且在中学读书一年以上。连城学生中除个别有大学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学毕业，或在中学读过几年书，可以说是“有些知识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学员。黄埔军校为吸纳培养中小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机会。从家庭背景来看，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大多家庭贫困，生活艰难。如李云贵、罗列等都生于贫苦农家，得亲友资助才得以读书，后考入黄埔军校。因为贫穷，许多学生从小对地主、军阀深恶痛绝，立志革命改变命运。李云贵曾谈到乐江李姓强房欺负弱房，曾言有朝一日必将这些分子铲除净尽，至此朴素的阶级仇恨播下了他投身革命的种子。^②此外，主要以血缘、乡缘和学缘关系的方式渗透到连城黄埔学生中，因为最初学生们多数都是通过亲戚、同乡、老师和同学等介绍来报考黄埔军校的。

（二）信仰各异、结局多元

连城学生是在国民革命浪潮里因地域关系、人文影响、家庭环境、个性气质及形势际遇等因素加入黄埔，多数为国民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山舰事件之后，随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主导地位的确立，国民党的政策由联共转变为限共、排共、反共，直至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每个连城学子都面临着严峻考验。他们呈现出了不同政治路向和人生道路的多元化结局。其结局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国民革命在北伐战争中牺牲。如陈永阳，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北伐时阵亡于山东。

第二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与北伐战争，后被国民党杀害。如江斗山，黄

^① 《连城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1983. 11, 第 53 页。

^②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1983. 11, 第 48 页。

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与李云贵、黄曦同任国民党连城县筹备委员。后有人说在三元（即现三明市）被国民党活埋。

第三类信仰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就义。如李云贵，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加入共产党。参与北伐后在张发奎部任连长，梅县战役腿部受伤，回闽任国民党连城县党部宣传委员。组织发动连南十三乡农民暴动，任红四军四纵队十九大队大队长，于一九三〇年涂坊战役英勇牺牲。

第四类国共合作时期为国民党右派，大革命失败后成为中间派，倾向共产党。如罗庆梁，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大革命后对国民党不满，放弃学籍归乡，后从事教育事业。

第五类任国民党军队军官，参与北伐战争，后在福建各县任职。此类人数多，共 8 人。如张履雄，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部队连长。后遁身佛门。

陈永南，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

罗廷徐，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曾任龙岩、古田军事科长。

陈长连，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

邓启群，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中级军官，后任东山县县长。

罗先志，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下级军官。

江震岳，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龙岩县国民兵团团长。

钱盛铤，在黄埔军校所属海珠学生军学习。曾在厦门警察局工作，后回家经商。

第六类参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大革命后追随国民党。此后政治态度有所变化，解放战争时起义，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如江道谦，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毕业，曾任国民党团长、军校重兵器教官等职。抗日战争转战滇缅铁路沿线任路警总队课长。后任过福建省政府参议、专员等职。解放前夕参加起义。

罗汝正，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与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国民党军队中官至中将师长。解放战争后期，汝正于 1949 年 9 月 25 日和陶峙岳等十名国民党将领联名通电给毛泽东、朱德，促成新疆和平起义。后协助陶峙岳将军迎接解放军进疆，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师和农八师师长，响应中央号召“屯垦戍边”，为保家卫国、建设新疆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修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北伐，在龙潭战役中负伤回籍。抗日战

争时后复回部队，于芦沟桥前线（冯治安部）参加战役，冲锋陷阵后再次负伤，回归故里。

江连钦，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队团长，后任福建省诏安县县长。解放前组织闽西起义，为解放福建作出贡献。

第七类参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去往台湾。该类共7人。

如童懋山，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国民党闽南师管区司令，一九四八年去台。

吴振刚，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闽北师管区司令，解放战争时去台。

李振声，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交警总队军官，一九四八年去台。

罗镇粤、吴承熹，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去台。

卢荣光，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后去台。

罗列，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以成绩优异破格录用为充东征军某团党代表。四一二事变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学习英语，出狱后考入陆军大学。后来被国民党招揽任命为胡宗南部参谋长兼陆军第一师师长，旋升军长，后随蒋赴台。

①

（三）破除迷信，为民除害

虽然连城籍黄埔学生信仰各异、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们都曾一腔热血参与北伐战争，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虽然军校条件简陋，但学生个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军校学生一般都具备军事力都有，而在黄埔学生不仅具有军事力，还兼具有组织力和动员力。黄埔军校模仿苏俄的党军体制，在军队内部设立政治部，培养了学生的动员力。在连城人心目中，李云贵是是黄埔军校生的典型代表。1928年李云贵任国民党连城党务委员会宣传委员，负责破除封建迷信活动。当时大赌棍罗老允公然与县党部对抗。公然游“城隍”，唱戏、开赌，扬言“城隍老爷”保护百姓平安，取消“游神”，就得罪菩萨，老百姓就会遭到瘟疫饥荒。李云贵假意屈服，让其放松警惕，看准时机连开两枪将其击毙，除掉了罗老允。^②此举既破除迷信，同时也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老百姓拍手称快，赞扬李云贵为民除了一大害。县衙里的官员们却惶惶不安，甚至到处张贴告示：有人捉得李云贵，一两骨头换两金。李云贵作为宣传委员，动员组

① 《连城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53页。

②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47页。

织群众的能力很强。每次召开群众大会均由李云贵讲演，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阐述破除封建迷信的革命道理，他讲话慷慨激昂，很受群众欢迎。他还亲自带着职员和青年学生到各寺庙去打掉菩萨的土木偶像。当任县长郑锡奎贪污枉法，李云贵发动群众弹劾，迫其自动辞职，又公选较有开明思想的前任县长吴有容复职，大得群众拥护，享有很高声誉。

李云贵秘密加入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遵照党的指示，他以公开身份加入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他与闽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家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着手发展共产党秘密组织，吸收同乡李云无当县党部文书，将李锯元安插在伙房当厨师，作为开展工作的助手。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李云贵首先在大垄坪组织了秘密农会，召集大垄坪、杨家坊的种田汉，手持柴刀、菜刀、长矛，偷袭了乐江（即杨家坊）民团李则三，公开向乐江地主抗租，借粮，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李云贵代表连城地下党组织向毛泽东等同志会报了连城革命斗争情况，并接受指示加紧连南暴动准备。连南的二百名武装编为第四纵队第七支队第十九大队，李云贵被任命为大队长，继续组织连南十三乡的农民武装暴动。“那些地主老财闻风逃命，来不及逃走的只好脆地求饶。”^①李云贵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会后，带领群众开仓分，分给贫农民三千多斗谷。这年秋收，农民不交租，只交二成的公积谷，用作革命经费。十三乡暴动的革命风暴席卷连南地区，邻近村子的农民也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支持革命行动，革命浪潮一时高涨起来。

连城青年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诸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地组织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破除封建、推动生产的事迹始终在民间传颂，为近代地方基层百姓衣食住行提供了很多帮助和便利。虽然在诡谲起伏的中国民主革命历史发展中不断产生聚合分化，形成了他们多元的人生道路，但在连城人心目中，他们始终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走在时代前沿的革命青年，是值得尊敬的战士。

三、苏区游击队干部

连城青年像星火点燃更多人的革命理想，他们前仆后继地投入革命的大浪潮

^①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48页。

中，将革命的火光燃遍更加广袤的中国大地。黄埔学生李云贵、罗庆梁等人回连城后迅速发展董成南、沈邦翰、李七养、巫显达、钱伯南、董友松等苏区游击队员干部，将苏区革命的火种继续延续。

（一）组织建立红色苏维埃

怀揣着报国理想的董成南经李云贵介绍秘密返回新泉，与在长汀求学的张瑞明、张育文和在集美求学的俞炳荣等进步青年取得联系，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秘密开展了革命活动，随后，他直奔长汀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转战于并岗红色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五月，“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董成南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灾难深重的闽西故乡。他一进县城，便日夜着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收缴民团武器，发动群众打土豪、烧田契、毁债约，分财物粮食给贫苦工农。并亲自帮助苦大仇深的店员工人沈邦翰组织“苦力工会”，建立工人武装，把连城的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劳苦工农兴高采烈，扬眉吐气，土豪劣绅胆设心惊，威风扫地。董成南培养了沈邦翰、李七养、巫显达、钱伯南、董友松五人为秘密接头户，教他们使用联络暗号、密码，和用药水纸写信的技术知识。沈邦翰同志及其领导的“苦力工会”会越发壮大，连城的革命斗争逐步开展起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四个纵队来到新泉进行整训。董成南在这次整训中调任第四纵队书记官。他把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详细的告诉群众，要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一齐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罚他们的歌，分他们的土地财物，扫掉他们的威风。劳苦民众的心扉象受到和煦的春风轻拂，感到分外舒坦温暖，整个连城县城在沸腾。一九三〇年四月，连南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新泉正式成立连城县苏维埃政府。董成南令回到新泉担任县苏主席。县苏管辖芷溪、儒畲、良福、池溪四个区和新泉市。董成南立即帮助文坊、上曹溪、金文、张家营等地成立乡、村苏维埃政府和游击大队。董成南认真落实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冬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调整分配政策，组织各乡将“耕田队”提高为“互助组”，成立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促进了苏区生产的发展。同年十月，闽西特委决定长汀与连城合并，成立汀连县，董成南被委任为新泉区区委书记。他与张瑞明同志等区苏干部团结战斗，紧密合作，经常深入各乡了解工作，并到群众中问寒问暖，搜集各种反映。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升后，王明左倾路线控制了临时中央的领导权，董成南被认

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含冤被杀在南阳茶树下。新泉的革命群众闻此凶讯，无不义愤填膺，连夜派人把董成南的尸体拾回新泉石排头埋葬。^①

（二）“只为穷人做实事，不为财主当鹰犬”

沈邦翰在共产党员董成南带领下，成立“苦力工会”，建立工人武装，人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在城关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后来红四军进城后，认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在城郊帮助组织起儿童团和赤卫队。沈邦翰深为这支部队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他主动找到军部，要求红军帮助训练“苦力工会”的会员，传授军事知识，使工会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激动地对会员们说：“现在我们手中有了枪。就不怕那些地主、豪绅、恶霸、土匪们了。”^②武装起来的城市苦力工人的斗争，在沈邦翰领导下蓬勃开展。全县八十多外商店的店员工人和手工业者，大都参加了“苦力工会”，他们一致行动起来，向老板提出了增加工资、提高福利、不许随意打骂和开除工人，不许克扣工资，不得干涉工人参加政治活动和革命斗争的要求。老板们面对着这些革命情绪一天天高涨起来的店员们无可奈何，对他们的要求不得不表一一接受。小手工业者們也一致联合起来，抗交各种背捐杂税。在这种形势下，一向狡猾的商会会长钱静波秉承伪县政府、县党部的旨意，来到苦力工会意图拉拢沈邦翰。一见沈邦翰便点头哈腰，“如今喜从天降啦！前些日子，郑县长看见老兄举臂一呼，工人乐从，足见沈主席才华出众。因此，郑县长决计要提拔你当商会付会长。兄弟有如此栋梁支撑，真是三生有幸！所以今日一来向沈主席贺喜，二来转达郑县长的美意。”沈邦翰听了这番话，果断地对钱静波说：“我是穷工人选出来的工会主席，只会为穷人做点事，不会为财主当鹰犬，你看错人了！”^③县游击大队在沈邦翰的领导下，不断扩大，建立了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击溃了流窜在罗坊一带的童友亮救乡团，狠狠打击了文亨、北团、宣和等地的罗藻、罗如林、曹真孜等民团，并帮助各区分配土地，大闹春耕生产。当时群众编了这样一首歌谣：“太阳一出暖人身，红军来到把田分，邦翰主席灭团匪，大家安心把田耕。”^④县委、县苏决定大力兴办人民福利事业，使劳苦大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翻身，还要在文化上获得翻身，解

^①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34页。

^②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37页。

^③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37页。

^④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38页。

决穷人子弟无钱求学的困难，沈邦翰和李明光同志亲自领导在城郊办起了东、西、南、北郊四个乡的贫民小学，进校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城里居民吃用水困难，沈邦翰和李明光同志便发动全城居民和附近农民在文川河的引水渠口上，改建引水渠道，把城里原有的那段渠道加宽加深，彻底疏通，把清澈的文川河水引进城内，还在城中央渠道边上修理两口水井，解决了城内居民吃用水的困难。沈邦翰处处以身作则，身为县苏主席，从不滥用职权，不搞特殊。一次，邦翰姐夫的一个亲戚是富农，当地政府杀了他家的两头大猪，邦翰的姐姐想说说情，被邦翰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和沈邦翰一道工作的人，无不称赞他廉洁率公，立场坚定，是个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沈翰继续发展县苏和各级政府的武装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巩固革命斗争成果。至一九三三年六月，在沈打翰的领导下全县十四个区，七十多个乡和大部分村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叛徒出卖，沈邦翰夫妇在清流被捕。虽然受尽百般折磨，他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面对伪县长的控诉，沈邦翰慷慨激昂地说：“对过去我们杀了你们的人，你很痛心，可是人民群众很解恨，你要将我斩草除根那是梦想！迟早一天人民会跟你们算帐的！”^①敌人恼羞成怒，将其残忍杀害。沈邦翰夫妇，在共产党的培养下，由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干部，为了穷苦人们的翻身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连城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册，他们的革命精神刻英雄形象永远活在连城人民心中。^②

四、革命记忆中的连城青年

连城青年多出生贫寒之家，从小饱受地主官僚的欺压。得亲友厚爱与支持读书识字。他们努力刻苦读书，在学校深受五四运动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对现实、社会和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逐步成长为进步新青年。连城青年心怀报国之志抓住时机积极进取，或不远万里赴法勤工俭学，或响应革命号召考取黄埔军校，逐步从进步青年向革命青年转变。他们在北伐战争中为打倒列强、统一中国英勇奋战，在抗日战争中为抵御日寇入侵而牺牲。然在时局动荡诡谲起伏的中国民主革命历史发展中他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信仰和结局，他们有的跟随共产党组织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他们有的四处征战、战死沙场，有的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独特贡献。在连城人心目中，他们是不听劝阻的叛逆孩子，是命运多

^①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38页。

^② 《连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组编，1983.11，第40页。

舛的苦命人，是为民办实事的好官，是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尽管革命历史记忆书写、革命人物叙事具有建构性、主观性的成分，但是这种建构和诠释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无不体现叙事者的价值关切。《连城文史资料》中对于其青年人物的选取和叙事夹杂着某些刻意的选择，凸显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连城百姓对革命青年的怀念和敬仰。

浅谈爱国侨领胡文虎

钟雅婷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胡文虎是南洋华侨传奇式人物，一生创办了多家企业、报纸，是著名的华侨企业家、报刊家和慈善家。但一直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胡文虎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爱国侨领，也有人说他是卖国的汉奸。文史资料多为历史当事人口述或撰写的第一手“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对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胡文虎祖籍为福建永定，永定文史资料中涉及胡文虎部分的作者多为与胡文虎有过直接接触或者间接接触的人。因此，对于研究者全面立体的了解胡文虎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史资料，胡文虎并非媚敌的汉奸，而是爱国爱乡的典范，在抗战期间，胡文虎曾捐款捐物支援国家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之后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胡文虎；爱国爱乡；慈善

胡文虎，出生于缅甸仰光，祖籍福建永定，是著名的华侨企业家、报刊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式人物，号称“万金油大王”。关于胡文虎是一个怎样的人，长时期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一位爱国侨领，有人说他是反动华侨，甚至有人说他是汉奸。本文主要以永定文史资料中所涉及的胡文虎部分为依托，浅谈爱国侨领胡文虎。

一、胡文虎并非媚敌的汉奸

关于胡文虎为什么会在公众心目中留下“媚敌”、“汉奸”的印象，主要原因在于其一，1943年2月17日，福建漳州出版的《福建新闻》发了一则题为“暴发户胡文虎蛰港奉承倭寇先后资敌数百万元”的新闻，文中虽然并没有直说胡文虎担任了伪职，但其中“奉承倭寇”、“奸心已动”的字眼，以及文中称其为“逆”，都极易误导读者，认为胡文虎很可能已经在汉奸组织里摊上了一官半职，也为后来的胡文虎担任香港维持会会长等流言准备了市场。其二，1946年12月18日，

厦门有多家报纸同时刊载厦门记者公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的消息，并用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以突出报道大会四项决议中的第三项：“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其三，在美国人包德华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中，“胡文虎”条目下写着“1944年，胡文虎被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主席。”这是第一次言之凿凿指陈胡文虎担任伪职的记载。^①

实际上，胡文虎所经营的万金油和星系报企业，横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它在帝国主义相间和中国、东南亚人民与日帝间复杂的矛盾斗争的夹缝中，寻求存在与发展。基于这些原因，胡文虎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热爱自己的祖国，支持东南亚地区人民；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与这些国家、地区的统治者周旋。

1941年胡文虎从重庆返回香港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文虎不幸在香港沦陷的当天被日寇拘禁。日军参谋长野村问它是否是“南洋华侨领袖胡文虎”和是否“大力出钱捐助抗日”时，他毫不掩饰的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忿然答道：

“我是中国人，本爱国天职，当然出钱资助政府抗日。”经查证，日本占领香港时，对胡文虎并非“待以上宾之礼”，而是将他软禁在半岛酒店。放回“虎豹别墅”之后，仍然派特务头目监视，胡文虎并没有行动自由。1992年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洪卜仁先生赴日本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期间，在日本一些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在东京大学“战略史研究室”秘密档案中，找到了当年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并带回了原始记录复印件，这些档案揭秘了胡文虎的“东京之行”，谈话中，胡文虎的表现在大节上并没有问题，只说了几句恭维东条的话，属于寒暄客套性质，关于胡文虎的不实之词通通都被推倒，并且这些事实都证明，胡文虎“东京之行”并没有出卖祖国，胡文虎多年的冤屈也得以洗刷^②。

二、胡文虎是爱国爱乡的典范

^①孔永松：《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没有出任伪职》，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92年第11辑。

^②林添华：《胡文虎“东京之行”揭秘》，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92年第11辑。

作为一名身处异域的华侨，胡文虎的一生，始终体现了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精神风范。他从早年热心祖国公益、慈善事业，兴办千所小学、百座医院，到抗战时慷慨输将，力助困难，从晚年发起“经建运动”，开发桑梓，再到祖国大陆解放后认购国债、支持新政等等，贡献巨大。这一切都足以体现，他是一个爱国爱乡的典范。

（一）捐款捐物 助力抗战

胡文虎曾说：“良以国家兴亡，人各有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毁家纾难，亦份所宜。”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胡文虎是捐资助战数额最大的华侨个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马占山将军率领部下奋起抗击，并向国内外发出“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呼吁支援的通电。新加坡华侨组织迅速响应，筹集捐款予以支援。胡文虎首捐2.5万元和大量药品，支援马占山坚持抗日。

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侵占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消息传到新加坡，胡文虎十分激动，立即打电报给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对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御敌的英勇行为表示敬佩。并通过汇丰银行汇出一万元，委托《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转交给中国红十字会，用作救护伤员的费用。同年2月下旬，淞沪战事愈加激烈，十九路军将士伤亡很大，胡文虎又汇去一万元和大量药品^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胡文虎立即令香港永安堂分行经理，把捐献的大批纱布、药品速运到内地，送宋庆龄转交何香凝创建的救护队。同年9月，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之计，特发行了5亿元救国公债，以作非常时期的开支。为此专门成立以宋子文、陈立夫为正副会长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胡文虎首购20万元，同年10月继购30万元。并在自己创办的星系各报上频发文章，号召各地华侨团结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两年后，他又将曾经捐助兴建1000座小学校舍的剩余款项200万元，全部认购救国公债。并在给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的信中写道：“强邻压境，国势险危，……文虎远寄南邦，责不敢忽，……救

^① 胡江平：《胡文虎与淞沪抗战》，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86年年第5辑。

国公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衷，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此信即由《星洲日报》刊发，引起海内外轰动，人们深为他爱国抗日的慷慨热情和赤子之心所感动。

胡文虎对于华侨工人为反对日本侵略而举行的罢工斗争，亦予以同情和支持。1937年11月间，新加坡一所学校的校舍，正由于华侨工人施工，许多侨胞因痛恨日寇侵略决定罢工停建。同年12月间，在马来亚一座日本人经营的铁矿里，也发生了罢工，侨胞罢工后，日常生活发生困难，胡文虎慷慨解囊，帮助他们寻找职业和维持生活，或出资遣送回国。

总之，胡文虎在抗战期间，为了支援国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捐款捐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心系家乡，造福桑梓

尽管胡文虎自八岁就离开家乡飘洋过海，来到国外居住。六十多年来，从未回过家乡，但他对于家乡的一切却是念念不忘的，一直以来都心系着家乡的一切，每次有乡亲来香港或者新加坡找他的时候，他都会询问家乡亲戚的近况。

胡文虎向来乐善好施，曾有叮嘱自己在永安堂的员工，凡是遇到举目无亲的外出同乡，有特殊困难需要帮助的，应酌情照顾。曾昭生是永定县下洋镇月流村人，西安解放前夕是一名国民党驻当地部队某师警卫队员，当得知师长坐飞机逃跑后，在西安举目无亲的曾昭生只好回老家，但一路辗转到上海时已经身无分文。此时他忽然想到了下洋人常说的大慈善家胡文虎，便想向他求救以获一线生机。于是他来到了上海永安堂寻求帮助并如愿得到了200万元（旧人民币）^①。

建设福建是胡文虎多年来的夙志，他在《努力建设福建》一文中说：“惟吾人切勿忘记，此乃吾人之福建，祖宗庐墓在焉。吾及吾子孙，亦将生息于斯焉，及吾人之身，尚欲逃避困难，不加建设，则福建之建设，又将期望于何时？”抗战胜利后，为了抚平战乱后祖国的满目疮痍，胡文虎决定必须发动广大海外华侨合力共建祖国。于是，他一面在星系报发表言论，号召华侨加强团结，一面主动与陈嘉庚搞好关系。在他的积极宣传发动下，闽侨一致行动起来，最终在新加坡成立了“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随后，胡文虎还建立了厦门经济建设公司。当被问及厦门经建公司的宗旨和经营范围时，他也表示当国家需要什么，缺

^①胡安生：《身受之惠》，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92年第11辑。

什么，他们就办什么，一切都视当前实际情况来决定^①。

（三）广济博施，热心慈善，振兴教育事业

胡文虎秉持“取诸于社会，用诸于社会”、“以己之财，供天下人之用”的信念，广济博施，是著名的慈善家。胡文虎经常说：我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也就是说，我的钱是从社会上赚来的，我要把钱用到社会上去。他还曾说：“我不主张把资金存入银行生利，而要用于社会事业，虽无利息可言，但在精神上所获得的快乐是无限的”。胡文虎先生规定以每年所得利润百分之二十五（后来又定百分之六十）作为公益事业的费用，而且是说到做到。他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监狱，以及其他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上都是非常乐意捐款的^②。

在教育事业上。胡文虎认为，我国贫困落后，教育不发达是一大原因。因此，他不遗余力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并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职志”，长期坚持不懈拨款资助国内各类学校。上海大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广州仲凯农工学校等大专学校均先后得到过他的捐款。对于国内侨乡许多中小学，胡文虎也尽力资助。1935年10月，他率领马来亚华侨选手来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时，曾宣布愿出资350万元，十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一千所小学，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祖国培养有用人才。后来由于永安堂盈利的激增，又将期限从十年改为五年。他对自己家乡福建省的办学更加热心，特拨款35万元，计划在全省建立一百所小学^③。

在医疗卫生方面。自20年代起，胡文虎就独资创建或协助捐建了许多医院、接生院、养老院、残废院、孤儿院、麻风院等。于国内而言，上世纪30年代，他先后捐建了南京中央医院、汕头医院等十二所医院。其中为筹建南京中央医院捐资近40万元。为建汕头，厦门，福州等医院时，捐资60万元。对各地卫生机构还捐献了许多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1937年，日寇蓄意侵华，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健康，胡文虎特捐了一千万元，汇存中国银行，作为兴建一百间医院的经费，虽然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计划并未实现。

^①江茂夫：《回忆厦门经建公司成立前后 与公司董事长胡文虎一席谈》，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92年第11辑。

^②罗铁贤、胡聚友、胡梦贤：《纪念胡文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83年第2辑。

^③罗铁贤、胡聚友、胡梦贤：《纪念胡文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83年第2辑。

除此之外，每有重大灾情发生时，国内慈善人士和团体就会向他致电致函，请其捐助款物或代向侨胞劝募。胡文虎对此类要求总是有求必应，不分族群、地域、宗教，一视同仁，竭力救助。“胡君历年在南洋创办公益事业，及尽力祖国事务甚多”，到1922年，他“创办公益事业及捐助国内之款约数十万”，随着永安堂业务扩大和盈利增加，捐助额度逐步提高，捐赠范围也不断扩大。

三、胡文虎的为人处世

（一）自奉俭朴、平易近人

胡文虎对自己的生活是简朴的，他在家里吃的饭菜是一般化的，对朋友的应酬也非常节省，有好几次，胡文虎与罗铁贤还有一位国民党的参议院三人去茶楼饮茶，每人只吃了“一盅两件”（即一盅茶两小碟点心），结账时仅仅花了四元半港币，但在当时，一般请朋友喝茶，起码每人都要吃五、六碟点心，连小账都要十元^①。他不仅在吃上很随便，对于衣着也很随便，在家里只穿衬衫，出外也只穿一般的西装。不仅如此，胡文虎也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的侄辈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虎叔”。胡文虎的侄辈胡玉香说，阿虎叔喜欢青年人，身边的“后生子”只要有一点突出的优长，即使表现在平常小事上，被他发现了，他会立即加以培养、信任，放在适当的岗位上，让他施展才能。可见，胡文虎也是一个会识人用人，善于从青年人中发现人才、造就人才的长辈^②。除此之外，胡文虎还是一个乡味极浓的人。阿虎叔心里时时念着故乡。他每年都要到印尼永安堂二、三次，办完业务，就和乡亲们拉家常。他最爱打听家乡消息和亲人情况。和乡亲们一起吃饭时，常常说：“吃来吃去，还是我们家乡的其头菜和猪肉炖菜干最好吃。”胡文虎每次来印尼，每次住上十头八天，临走总会给侄辈们每人一个红包，并叮嘱他们好好干活，有了钱一定要回家乡看望亲人，为家乡做点好事。

（二）孝顺父母，严管儿子

胡文虎先生毕生切实履行中国的传统美德——忠孝。不论他走到哪里，行李中都会携带其父母亲的遗照，并且到达目的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遗照取出，摆放在桌子上，完成这件事后，才会继续进行其他事。甚至在逝世前身患重病治疗于

^① 罗铁贤：《关于胡文虎先生的片段资料》，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82年第1辑。

^② 胡玉香：《忆阿虎叔三四记》，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92年第11辑。

波士顿医院时，也会把双亲的遗照放置于病榻旁，不时虔诚凝望。^①胡文虎在香港时，还曾向香港政府购买了一座高山，在山麓建了虎豹别墅、花园、泳池等，在半山建了水泥钢筋牌楼，牌楼上，镶上了他父母的瓷像，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沿着石阶走上半山的牌楼下，向父母的遗像行三鞠躬，行礼后才开始完成一天的工作。并且每天都是如此，风雨无阻。他对于孩子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他的儿子胡好担任星岛日报社社长时，被规定每月只准支薪五百元，不准超支。^②

（三）不畏强暴，不阿权贵

胡文虎先生为人是非常有个性的，他是一个不畏强暴、不阿权贵的人。胡文虎在三十年代听闻法帝国主义曾经在上海法国公园门口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非常愤慨。因此，后来在新加坡巴丝班让开了一个游泳池，也在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书“只准华人入内游泳。”^③香港沦陷时，胡文虎曾被敌人囚禁，在被敌人囚禁期间，敌人对其进行盘问，他竟丝毫不畏惧敌人的审问，直言自己就是胡文虎，并表示为支援国家抗战捐款捐物是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做的。胡文虎并没有畏惧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是用行动展现了自己的不畏强暴、不阿权贵。

^① 罗懿：《永定华侨旅居板城简史》，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95年第4辑。

^② 罗铁贤：《关于胡文虎先生的片段资料》，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82年第1辑。

^③ 罗铁贤：《关于胡文虎先生的片段资料》，永定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永定文史资料》1982年第1辑。

地方的记忆：漳平革命斗争史研究

吉浩鹏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漳平作为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东大门”，闽西、闽南、闽东三地交锋要地，在打破蒋介石三省“会剿”计划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基于《漳平文史资料》文本，回顾漳平两次解放的经过，从中得出漳平解放斗争胜利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反动势力的腐败无能，并将漳平革命斗争历史意义延伸至现代，正确认识革命斗争对于当时参与者和现代叙事者产生的不同影响，探讨挖掘和利用好红色资源的路径，进而传承红色血脉、发扬红色精神。

关键词：漳平；革命斗争史；文史资料

漳平位于福建省中南部，闽西东部，处于龙岩、三明、晋江、龙溪四地交界处，隶属龙岩市管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发生过数次革命斗争，自 1929 年红四军入漳后先后经历两次解放，期间一度沦为敌占区，最终于 1949 年 9 月正式解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漳平作为中央苏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一直是红军的战略前沿阵地，承担着巩固闽西苏区东大门的任务，在当时的“红白斗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今基于历史逻辑回顾漳平党组织建立到漳平解放的过程，梳理漳平解放斗争亲历者以及几十年后的描述者对待解放的观点，从对比中明晰漳平解放对于传承红色血脉、发扬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意义。

文史资料作为一种史料，是我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料，其不同于其它的史料，它有着独特的编辑形式、丰富的历史记载、灵活多样的写作方式，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同志主持推动文史资料的编辑撰写以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已经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文史资料，本文便以漳平市政协文史资料为文本，探究资料中记载的漳平革命斗争历史，进一步思考如何用好漳平红色文化、发扬红色精神。

一、漳平革命斗争的经过

（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漳平的解放不是偶然事件，其中有着必然因素，红色革命要想在一片土地上发展起来，必须具备红色基础——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漳平作为闽西地区最早发展共产党员的地区，早在1924年，郑超麟、陈祖康便在莫斯科和法国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回国后致力于党的宣传、组织工作。1924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漳平涌现了一批以陈国华、陈文成、陈天枢为首的青年共产党员，他们积极组织开展漳平的革命活动，为漳平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革命基础。1928年7月，中共革命领导人邓子恢直接领导成立了漳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龙车支部，并于次年解放漳平后成立了永福区委，为漳平这块土地播下了革命火种。至此，漳平红色苏区的建立便具备了良好的革命基础和组织基础，而红四军进驻漳平又促进了漳平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漳平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二）第一次解放漳平

1929年8—9月，为粉碎闽粤赣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发动的三省“会剿”，中共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毛泽东、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经商议决定“朱德率二、三纵队和军部向漳平方向打开缺口，到敌人力量较薄弱的闽中进击，扩大影响，牵制敌人。”^①此次出击闽中前后共37天，在漳平境内开展革命斗争28天，涉足漳平13个乡镇街道、100余个村庄，取得全歼国民党军张贞部张汝匡旅两个团的重大战绩，直接促成漳平红色武装割据形势的发展。8月3日，朱德率红四军从白沙进军宁洋并一举攻克宁洋县城，7日沿双洋溪南下到达南洋，8日上午便攻克漳平。红军入漳初期，漳平人民受到国民党蛊惑，认为共产党“抓人杀人”、“放火烧厝”，但红军纪律严明，进城后张贴告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成功取得当地群众的信任，亲历者陈善述医生对暂住家中的红军讲到：“你们很好，跟反动派造谣的完全不一样，”^②之后便为受伤的红军看病治伤，诠释了军民鱼水之情。随后，红军于8月19日全部离开漳平，国民党得知后派张汝匡旅两个团重新占领漳平和溪南。由于闽西形

^①郭雪峯 邱水才 黄瀚：《红四军进军漳平、出击闽中》，《漳平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10月，第1页。

^②陈善述：《爱民如子 秋毫无犯》，《漳平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5月，第12页。

势危急，8月28日红四军重返漳平，于29日拂晓打响溪南战役，30日上午重新解放漳平，并于31日乘胜追击消灭张汝匡残部和永福一部分民团，至此红四军第一次解放漳平取得圆满胜利，而这次战役也成为红军入闽后的七大战役之一，不仅有利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剿”计划，而且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群众基础，为后续中央苏区的建立提供革命条件。

（三）第二次解放漳平

由于漳平地理位置特殊，在第一次解放后不久，国民党和当地反动势力便陆续对漳平进行进攻，红九军、红十二军、红二十一军等部队不断支援漳平，持续多年的拉锯战由此展开。之后红军长征，漳平的革命工作转入地下，1934至1945年间，漳平境内革命工作虽然艰难，但得到了当地群众热烈响应，据记载，“全县属于老革命根据地的有五个公社，四百多个自然村，其中革命基点村三十个。”

^①直到1949年，漳平重新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1949年春末，随着傅作义、程潜等人的起义，时任漳平县三青团干事长的刘子熙从福州参加完参议会回来后，响应中共党组织的号召，负责漳平境内的武装起义事项。在起义前一个月，刘子熙秘密召开多次会议，晓以情理，发动当地群众参加革命，并先后说服了当时的“民众自卫团”总团副曾文光、副官丘家鑫、国民党党太示范乡乡长范启文等一系列重要人物参与起义。借助国民党抽调壮丁补充“民众自卫团”的时机，党组织在各个乡镇以及县城中间安插眼线，积极发动民众。随后，“闽粤赣边纵队八支队四团总支部派出以钟炎（王新整）为首的一批工作人员，来漳平组织领导起义工作。”^②6月19日，为了能够顺利攻打漳平县城，民兵先于19日攻下县城外围溪南下林、新桥圩、华口三个据点，伪县长卢智锷闻悉于20日下午弃城逃跑，加快了解放漳平县城的脚步。到6月21日为止，全县共有八百多民兵参加起义，加上四团调派的一个营三百多人，共计千余人于21日上午进入漳平县城，漳平时隔多年再次迎来解放。然而没过多久，国民党于7月16日集结刘汝明第五十五军左营及地方反动势力反扑漳平，最终漳平革命势力因寡不敌众，暂作战略转移，漳平复陷。此次沦陷敌人的不仅镇压了县城革命势力，而且波及到周边各个村庄，城关、党太、溪南、和平等地的革命人民均遭受惨绝人寰的清洗，但星星之火一经点燃便再难熄灭，国民党的这次

^①漳平县地名办 老区办：《漳平县概况》，《漳平文史资料》第1辑，1982年9月，第5页。

^②范启文：《走向革命 获得新生》，《漳平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5月，第18页。

清剿不仅让当地群众认清了国民党的残酷本性，更是点燃了革命人民的怒火，新的革命力量应运而生。8月11日，县工委调集4个连兵力趁守城兵力空虚之际攻打县城，但因后续部队接替不上，被迫撤退，此次攻城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后续“9·13”攻城提供了宝贵的战斗经验。8月末，随着福州的解放，共产党情报得知县城国民党已撤离，仅剩伪军，因此作出再次攻打县城的决定。9月上旬，各路人民武装部队先后集结于县城外围，县城国民党见处于孤立之势，便派当地乡绅进行谈判，作缓兵之计。9月11日，县工委和营部下达攻城总命令，战斗分西、东、北三路进行，战斗直到12日下午才结束，13日漳平全境解放，至此，沦陷了的多年的漳平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二、漳平革命斗争胜利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两次解放漳平期间充分调查当地情况，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调整政策，将当地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革命，发挥了主心骨的领导作用。第一次解放漳平前期，中共党组织便在漳平一带发展党员、设立党支部，建立革命根据地，做好了革命前期保障工作。如果说红四军进驻漳平是践行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发展红色力量的必然要求，那么蒋介石的三省“会剿”计划便是导火索，将这片土地上的红色之火点燃。在进驻漳平后，红军立即打土豪、分田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同时成立农民协会、赤卫队，从军、政、民三方面推动漳平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第二次解放漳平期间，党组织深知县城反动势力军心散乱，民声怨愤，因此采取逐个击破的策略，通过策反和发动当地群众共同革命，先拔城外火力点，再孤立城内反动势力，最后一举歼灭。两次解放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是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核心，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场人民战争才能打赢。

（二）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

漳平的两次顺利解放离不开有各参与主体的努力，本文将参与主体主要分为直接参与战斗的红军和当地参与战斗的工农群众。一方面，第一次解放漳平直接参与战斗的红军有红四军二、三纵队，以及后来的红八、红九、红二十一军，第二次解放则有闽粤赣边纵队八支队第四团，前后两次总计兵力达三千余人。另一

方面，当地群众也积极参加战斗，如陈善述医生、木匠郑柏团起初对红军敬而远之，后经红军宣传后拥护红军；原三青团成员傅启壮也是在刘子熙的鼓舞下参加解放战争；闽粤赣边纵队八支队四团五营十八连、十九连战士邱振福、廖光前、吴剑平、林李士、官友生等人均是由当地民兵改编而来，正是当地人民对党的军队的倾囊相助，才使得漳平解放战役胜利的如此迅速。此外，还有一部分参与者隶属漳平县政工作团，在第二次解放漳平期间负责领导漳平工作，它们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为当时党组织开辟新的区域，培训干部做出贡献。

（三）反动势力的腐败无能

漳平的反动势力虽然隶属国民党军队，但其军队成分复杂，既有国军又有伪军，兵力不足时还会从周围村庄强征壮丁以作补充，因此其军纪松弛、军心涣散，间接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再加上当时占领漳平的陈祖康、陈半帆、卢智锟等领导者欺压群众、胆小怕事，毫无作战经验，致使反动势力在战斗中不得民心、节节败退，从而为漳平的顺利解放埋下伏笔。

四、漳平解放对不同时代人们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①，红色资源承载着党的一百多年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凝聚着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英雄品质，是宝贵的民族财富，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深入挖掘红色资源中蕴含的红色精神，是增强人民大众历史自信、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培养高素质德才兼备人才的必然要求。漳平的革命斗争历时 20 余年，探究漳平革命斗争史不仅有利于明晰斗争对于参与者以及后来叙事者的影响，更有利于以小见大，推动红色精神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阶段的今天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一）对漳平革命斗争参与者

第一，革命斗争增强了参与者的政治认同感，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漳平革命斗争参与者大多为漳平本地人民，他们在漳平解放之前文化水平有限，缺乏政治认同，然而在解放漳平过程中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影响，对于党的政策、宗旨持坚定的拥护态度，并树立起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如原三青团干事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45 页。

傅启壮回忆道：“我有幸参加这一义举，尽了一份力量，现在回顾三十多年前的经历，不是没有意义的。”^①漳平县政工作团成员吕沁感慨道：“漳平县政工作团……对开辟新区，为新区培训干部方面，作出一定贡献……对向往革命的青年起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作用。”^②因此战斗不仅打倒了反动势力，而且提升了当地人民的革命文化素养。

第二，革命斗争锤炼了参与者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品格和意志。十八连连长范启文回忆：“游击战期间生活相当艰苦，缺少粮食……虽然如此，大家并不泄气，仍然斗志昂扬，不怕风餐露宿，咬紧牙根，继续坚持下去，度过难关。”^③宁洋地方工作团成员李海桢感慨：“当年的情景……无意地是对每个革命者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形成坚强意志的血与火的磨炼。”^④突击队队员官友生感慨：“当年的战斗激情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党指引的更加宏伟、壮丽的“四化”建设大业中。”^⑤漳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必须继续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在锤炼自身意志中奉献青春之我。

（二）对漳平革命斗争叙事者

在叙事者看来，漳平革命斗争的史料考究、整理、撰写为漳平留下了宝贵的革命财富，为历史上一些史事的证明提供了补充材料，同时也加强了对叙事者以及阅读者的党史教育，使漳平革命斗争影响的时空范围不再局限于当时当地，对后来者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如曾争在撰写竭坤英参加闽西起义的情况时认为“闽西起义军档案为竭坤英的起义行动做了历史的见证。”^⑥郭雪峯、邱水才、黄瀚在叙述《红四军进军漳平、出击闽中》中认为此次进漳“完成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分散转移敌人目标，分散敌人的力量，’和省委提出的‘牵制反军向闽西进攻，保卫闽西的胜利’的任务……对漳平人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漳平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⑦叙事者不仅在叙述过程中深入了解漳平革命斗争

^① 傅启壮：《回顾起义的经历》，《漳平文史资料》第5辑，1984年5月，第17页。

^② 吕沁：《记漳平县政工作团的战斗生活》，《漳平文史资料》第5辑，1984年5月，第10页。

^③ 范启文：《走向革命 获得新生》，《漳平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5月，第20页。

^④ 李海桢：《曙光在望战犹酣——原宁洋县解放前夕的斗争》，《漳平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5月，第16页。

^⑤ 官友生：《“九·一三”攻城战斗亲历记》，《漳平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12月，第13页。

^⑥ 曾争：《竭坤英参加闽西起义的情况》，《漳平文史资料》第5辑，1984年5月，第14页。

^⑦ 郭雪峯 邱水才 黄瀚：《红四军进军漳平、出击闽中》，《漳平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10月，第5页。

事迹，而且能够从旁观者视角明晰革命斗争的意义，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五、结语

漳平作为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从1926年郭滴人建立农民协会领导闽西地区武装一开始，就为后来红军离开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建立和扩展奠定了基础，之后红军第一次解放漳平，粉碎国民党的“会剿”，更是为整个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提供了保障。虽然漳平连年战火不断，但这片土地上的革命火种早已播下并悄然升起，直到漳平胜利解放的那天，漳平人民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斗争。回顾漳平革命斗争史对于我们学史明理、知史明鉴，用好红色资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是横向挖掘红色资源。通过搜集记录漳平的红色遗址、遗物，并加以保存修缮，让这些红色资源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实地感悟的形式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二是纵向挖掘红色资源。每个革命遗址、烈士遗物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深入挖掘这些红色资源背后的红色故事，发挥红色资源教育人、引导人、感染人的作用，从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弄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地方革命记忆：清流县人民眼中的“苏维埃”

吴思怡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

摘要：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地域视角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与内容，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与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然特性与差异之中常又凸显其共性所在。本文深入挖掘地方文史资料，通过分析探寻原中央苏区 21 县之一的清流县对中共苏维埃革命历史时期的地方记忆建构，进而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和特征。

关键词：“苏维埃”；清流；地方记忆；革命记忆

“记忆场”，又称记忆场所、记忆场域、记忆地点等，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并使用的重要概念。^①他在《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一书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经典的阐述：“对记忆之场的研究发生于两场运动的交汇点上……这两种趋势都使得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同时去照观历史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我们记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对象：如档案，如三色旗，如图书馆，如辞书，如博物馆，同样还有各种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和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词典》和巴黎公社墙。”^②基于此，文史资料、留存下来的遗址遗迹常作为一种记忆场域与回忆空间成为了个人或集体记忆的承载体，而这些承载体又似乎不可避免地“与地方”相联结。于是当“地方”与记忆纠结在一起时，地方就不再是仅具备自然属性的物理存在空间，而是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贮存场所，成为了一处充满场所精神与集体记忆的文化和意义空间，这种意义通常是由人的社会生产活动所赋予的。^③

清流，建县于北宋元符元年（公元一千零九十八年），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①丁华东. 记忆场理论与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思考[J]. 浙江档案, 2019(07):9-11+18. DOI:10.16033/j.cnki.33-1055/g2.2019.07.005.

^②（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红艳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0 页。

^③罗易扉. 地方、记忆与艺术：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8(02):148-157+231. DOI:10.13613/j.cnki.qhdz.003237.

争时期著名的中央苏区和红色革命根据地。清流苏区始创于 1930 年，是原中央苏区 21 县之一，1933 年秋达到鼎盛。早期清流苏区为闽西苏区的一部分，后 1934 年 5 月因中央苏区行政区划调整，与宁化、归化、泉上、彭湃等县苏区一并改隶闽赣省苏，成为闽赣苏区的一部分。全盛时期，清流县苏维埃政府下辖 6 个区、55 个乡苏维埃政府，范围极广，包括现清流全境、永安的罗坊乡、连城的塘前乡、宁化的安乐、谢坊、马家、路北、洋背等区域，面积 2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近 6 万。^①如前文所言，地方总是不可避免地充满着历史、记忆、情感以及象征意义。^②清流苏区作为中央苏区的东方堡垒，为中央苏区建设与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和巨大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清流文史资料的记载真切地反映了其逐渐成为“苏维埃区域”的过程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以及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活动在当地民众心中所引发的情感波动、观念变化和愿景期待，构建起了属于当地人民的革命集体记忆。由于发生作用的地理空间与具体对象各不相同，中共革命在不同地域视角下所留存的历史记忆、所具象化的事件与行动也存在差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显露出中共革命的普遍性特征，呈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中共革命的基本走向趋势。因此，借助地方文史资料对“于清流县人民而言，‘苏维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中共革命的具体样貌与历史意义。

一、“苏维埃”是什么

在探寻清流县人民眼中的“苏维埃”之前，有必要对“苏维埃”一词的内在含义做相应的廓清。“苏维埃”其最初的本义是“会议”，原是俄国本土的一种会议组织，最早或许能够追溯至俄国长期形成的村庄自治传统，后作为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成为一个特有名词。一开始它是俄国 1905 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简称，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后演变为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1917 年，“苏维埃”作为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渐成为和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③这种于 1905 年和 1917 年两次革命期间由工人和农民各自组织

^①江天德：《清流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清流革命遗址遗迹通览》，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 页。

^②舒璋文、庞艳宾：《地方记忆与日常生活——越南归难侨的家园建构[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03):33-40。

^③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72 页。

起来的机构被称作“苏维埃”，且这一带有浓厚本土色彩的组织传统被列宁尤为重视，具体体现为在《四月提纲》中他广泛号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自此一种自下而上的苏维埃制度在经历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之中正式建立起来了。^①此后，列宁更是从理论上确立起“苏维埃”的地位，将其称作是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②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眼中，“苏维埃”是一种能够较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民主相结合的新兴民主政治形式。^③

国内学者杨奎松将其视为一种权力机构并概括出其具备的三个特点：一、不按照区域而是按照生产单位进行代表选举；二、废除了三权分立，使代表会议成为一种集立法、行政、司法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高效率独裁机关；三、是共产党人实现自身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完全剥夺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④何友良对中国苏维埃革命这一概念的出现、阐释与流变进行梳理，考证了“苏维埃”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国报刊上应该是1919年11月，即指张君勱游历欧洲时搜集翻译了最新的苏维埃俄国宪法和德国魏玛宪法草案并分别发表在《解放与改造》和《时事新报》一事，^⑤并指出1920年前后“苏维埃”一词在上海、北京知识界以及国内主要报刊上已经是一个较为流行的词语了，这一时期人们对“苏维埃”的了解不仅限于其本身为议会这种代表制机关的词语本义^⑥，还对其有了性质上的认识——即列宁“创造了一种新式的国家——苏维埃——给劳动阶级以参预新社会的自由建设之机会”^⑦，“苏维埃则为一种政府之形式”^⑧，“苏维埃是一种政治制度”^⑨。唐国平发现，当苏维埃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后，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对“苏维埃”一词的理解与认知各有不同。将其音译为“苏维埃”的张君勱认为它是一种权力机关，由他所翻译的德、俄两国新宪法，成为1920年前后论职业代表制的重要文本依据，“苏维埃”译名也悄然在中国知识界流行；

^①蒋凌楠：“苏维埃”概念引入中国的思想史探究[J].中共党史研究,2023(04):29-40.

^②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

^③周海乐：《第二国际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32页；唐志宏、谭继和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8—12页。

^④君勱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6号（1919年11月15日）；君勱译：《世界新共和国之宪法》，《时事新报》1919年4月11日。20世纪30年代张君勱对翻译两国宪法的回忆，参见张君勱：《我与宪法》，《再生》第2卷第9期（1934年6月1日）。

^⑤何友良：苏维埃革命概念的兴替及其话语表达[J].苏区研究,2023(02):13-38.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3.02.002.

^⑥吕琴译：《建设中的苏维埃》，《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6号（1920年3月15日），第24页。

^⑦沈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东方杂志》第17卷第3号（1920年2月10日），第38页。

^⑧张慰慈译：《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83页。

^①以 1920 年 2 月《东方杂志》所刊登的沈雁冰《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译文为例，该著作作者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劳工运动组织者戴维斯，戴维斯是这样描述和介绍苏维埃的特征：“代议士之选举，不以地理为单位，而以业务为单位。”^①李大钊深受该时期日本对俄新政府翻译名称的影响，将其视为“劳工联合会议”“劳工会”；陈独秀认为是“劳动专政”；远在法国的蔡和森看来，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是一种用于实现无产阶级本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与重要手段。^②上述在中国流行的不同知识分子认知下的“苏维埃”概念明显具有职业代表制特性与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政治特点的两种不同内涵特征。同时，唐国平进一步指明：虽然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对“苏维埃”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仍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具体表现为均从政治角度去理解其内涵并在其属性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苏维埃”政权是为底层工农兵谋求翻身做主人，让劳动者获得政治地位摆脱资产阶级压迫，真正掌握国家政权。^③由此可见，“苏维埃”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夺取政权后实行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反压迫剥削和无产阶级专政自治的双重属性，已在知识界形成了共同认知，并在不久之后的中国农村地区开始了具有中国国情特点的新的苏维埃制度建设，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时期。

二、清流县人民记忆中的“苏维埃”

地方，是充满人类经验和意义的空间。^④每个人具体的生产生活这些生命活动总是离不开具体的物理空间，每个人都生活在地方之中，而每一处地方也因人的活动不断拥有着意义、构建起社会关系、逐渐形成身份认同。一方面，人们通过地方安放与储存记忆；另一方面，人们也通过记忆建构地方，使其具备起某种象征意义。当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清流县人民心中点燃时，在清流的这块土地上便形成了革命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常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群对过去的建构，^⑤在建构过程中可以寄托社群的认

^①[美]Jerome Davis 著、雁冰译：《俄国人民及苏维埃政府》，《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3 号（1920 年 2 月 10 日）。

^②唐国平. 中共诞生前后“苏维埃”思想的引进和确立[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2(04):65-73.

^③包亚兄, 石义彬. 情感连接与政治激化——湖北旅台同乡的地方记忆与地方认同[J]. 台湾研究集刊, 2021(01):26-35. DOI:10.14157/j.cnki.twrq.2021.01.003.

^④H.Schuman & J.Scott: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年版, 第 359-381 页。

同、反映社群的现状与愿景并赋予其实质的意义，但同时也会随着社群主体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记忆内容与特质。因此，对于清流县的人民而言，他们记忆中的“苏维埃”究竟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在当地人民的记忆书写中又存在着什么样的特质？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挖掘与探讨。

（一）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参军等活动成为清流县记忆中“苏维埃”的重要内容

对某一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是人们记忆地方和空间的重要载体。^①清流作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维埃政权在其境内的建立、巩固与斗争无疑是清流人民记忆清流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当地人民对于“苏维埃”的理解与认知则具象化为一系列事件和具体的行动，从清流文史资料记载中来看，“苏维埃”在当地人民眼中表现为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参军、促进地方文化经济与安全稳定发展的众多革命活动与配套的组织形式。清流县苏维埃政府革命史简介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总体性叙述，“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乡、村大多数都进行了土地革命，斗争了土劣，将封建统治阶级的田契、债务剥削字据都没收烧毁，群众分得了土地、房产，都喜气洋洋，高呼‘共产党万岁！’‘毛委员万岁！’。”^①、“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各地各种群众组织也相继组织起来，如工作团、土地委员会、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游击队、后备队、妇女队、贫农团、交通队、担架队。劳动队、农协会等等）发展有 2450 余人。”^①其中李坊作为清流县第一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当地开展的尤为轰轰烈烈，这与当地人民受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的程度之深厚密不可分。数据统计，李坊全乡原有一百八十多户，八百九十多人口，土豪劣绅仅有九户却占有着全乡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火炉当棉袄，糠菜半年粮”道出了当时李坊人民所遭遇的苦难境遇。^①因此，在经历过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及散发的材料宣传下，曹登昂、李光耀等人在曹坊等地暴动后与曹坊区苏维埃政府接头寻求帮助建立乡苏维埃政府。李光耀等人回到李坊后立刻召集了李坊、黄竹潭、杨坊等五个自然村群众在杨坊东岳庙召开会议，李坊苏维埃政府由此宣告成立。群众们情绪高昂，会后立即冲入洋背大土豪罗开水家，缴获其步枪两枝，并开仓分粮。^①荷坑乡也大同小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组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16、14、18、19页。

异，召集群众在村口荒丘地瓜田中开了个群众大会，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旋即开展了打土豪工作。城北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也同样如此，苏维埃政权一经建立，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打击当地土豪劣绅分发土地给贫苦农民。

除此之外，“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当地人民眼中意味着自身的解放与成长，于斗争中能够实现一种相对稳定、不受压迫的生活状态。长校苏区中留存的几首革命歌曲歌词鲜明的体现出苏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思想上得到了较为显著的解放，如《韭菜花开》唱到，“韭菜开花一杆心，十二、三岁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自由结婚更开心。”；《革命一定要成功》歌中提到，“我们起来闹暴动，反对大军阀……农村大革命，打土豪，除劣绅，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五洲庆大同。世界大革命，一定要成功。”；《剪掉髻子当红军》亦有“打倒（那个）反动派罗！斗（那个）敌人一扫光罗！保护（那个）红军（那个）万万岁呀！割掉（那个）髻子（那个）也甘心罗。”等反对旧的封建礼教、主张与反动派们进行革命的相关歌词。^①“自由结婚”、“农村大革命”、“工农专政”、“割掉髻子”等象征着新思想的词汇的运用均体现出当地群众在苏维埃革命政权建设中一定程度上了解并认同红军传播的新思想观念，并在接受理解的基础上将其编成朗朗上口的歌曲进行流传传唱，虽然其部分用语如“万万岁”、“大同”仍带有传统文化的色彩，但其主基调仍保持着一种进步、追求自身解放、冲破封建束缚的革命精神。而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由此进一步建立健全，机关合作社、粮食调济站等贸易部门，邮政、医院、列宁小学也陆续发展起来，工人、妇女、儿童均有机会参与到政权建设之中，具体体现在：清流成立了县工会组织，城市工人在党和工会领导下与老板订立增加工资合同，领导纸业工人做缴槽、开槽的斗争，解决工人失业问题；青年、妇女也进一步组织起来，在扩大红军、慰劳红军等工作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②其中村民李盛喜从闽西帆船工会调到瑞金中央党校进行学习深造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工人模范排的成立更是给当时苏维埃政权下的清流人民带来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他们主要负责城区的警戒工作，每条街均有木栅，晚间关闭，白天开放，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三辑》，1985年版，第21-22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二辑》1984年版，第21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三辑》，1985年版，第7、10、5、6页。

并设有巡逻班，布设岗哨，检查出入行人等。^①由此可见，在清流县苏维埃政权建设期间，中共苏维埃革命与其地方性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两者一起形成了既具有地方性又具有普遍性逻辑的革命记忆。

（二）曾德高、刘德元、伍先球等烈士是清流县记忆中“苏维埃”精神的重要体现

中共苏维埃革命斗争中避免不了流血与牺牲，对“人”的记忆，往往成为人们了解和记住某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渠道。在清流县人民的记忆中，“苏维埃”常与当地人民的英勇抗争事迹与地方英雄儿女紧密联结在一起。当地文史资料着重记叙了曾德高、刘德元、伍先球、邹春才四位在苏维埃政权保卫中壮烈牺牲的具体事迹。他们具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如资料中分别描述到四人的出身背景，贫农出身的曾德高，土地革命时期才三十多岁；刘德元的父亲是雇农，租地主土地耕作，终岁勤劳，难以果腹，因此家中除有几件破屋外别无所有，年轻的他还需肩负起照顾家中父亲与妻子的重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依靠租种地主土地对半交租，家中有妻、养女等三人，过着“火炉当棉袄，糠菜半年粮”贫苦生活的伍先球；租住裴家屋，租种地主田，家庭十分穷苦的邹春才。整体上看，虽然四人各自的成长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但对于他们经济水平的介绍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流县投身苏维埃革命建设的多数主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尤其是当“为人老实，诚恳勤劳，从小就帮助家庭做些小点去卖，靠着双手勤劳度日”的刘德元在受到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德高动员时，他“欣然从命，到县苏工作”，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革命队伍之中这一举动更是生动体现了当时“受苦人民盼解放，贫下中农要革命”的形势所趋与人心所向，^①也深刻反映出苏维埃革命斗争所蕴含的“劳苦大众反抗压迫翻身做主人”的政权本质。

其次，对清流县在苏区政权建设过程中踊跃出现的烈士在性格特征、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细节刻画，均意在将他们的个人品质投射到所有参与苏维埃革命、反抗阶级剥削的清流人身上，塑造出清流县人民在那段苏维埃革命时期坚贞崇高、勇于革命、不惧流血牺牲的整体形象与精神意志。资料记载，1932年初，曾德高带领游击队七十多人到叶坊打反动民团，不料刚进村时就被团匪两百多人包围，“他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反复与敌搏斗，终因众寡悬殊，弹药俱尽被俘”，“敌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33页。

人将他绑在横锁戏台上，百般威迫，用尽酷刑，要他交代组织，曾德高横眉怒目大声回答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从容就义”；①刘元德在“打土豪过程中，凡是条件属于土豪的，即使是自己的至亲，也毫不隐瞒怜惜；不够条件的，虽属外人也不许乱打。如他的岳父吴鸡保，他的姑丈晏为善，亲戚罗细汝等，被定为土豪后，按章办事，没收了他们的不义之财”；伍先球同志则常率领游击队与白匪作战，打仗时“他大喊一声：‘冲呀’！自己带头冲向敌阵”，并在被捕后对来看望自己悲忿交集的妻子陈月姬坚毅地说道，“‘革命流血不流泪’！敌人肯定不会饶我，我也坚决不会投降，我死在敌人手里，为革命牺牲也是无尚光荣，你也要坚强起来，为革命培养好后代！”；邹春才同志在东方军解放清流、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亲自带领干部深入新解放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各区乡苏维埃政府；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参军晕倒，在他的鼓励下，有一百五十多人参军，成立了独立营。”。②不论是为开创清流革命根据地而慷慨牺牲，鼓励同志继起奋斗的曾德高，还是年小志大、爱憎分明，在执行党的政策中显露出来的坚决果敢、办事大公无私性格特点的刘德元，抑或是英勇善战、每战身先士卒、充满着勇敢杀敌奋斗精神的伍先球和勤勤恳恳致力苏区建设事业，发展生产改善苏区人民生活，坚贞不屈直至壮烈牺牲的邹春才……③这些为了革命从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反映了苏维埃革命的抗争意识与寻求自身解放获得自由平等的美好精神，构成了清流县人民对“苏维埃”精神的共同记忆。

（三）东方军克复清流对清流县记忆中的“苏维埃”政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东方军，组建于1933年7月，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下认为我军进攻失利是由于一方面军“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④所造成的，因而提出红军主力应当分兵，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方针下的产物。于是，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分为二，组成“东方军”“中央军”在闽、赣两省分离作战，再合兵夹击抚州、夺取南昌，试图以此打破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五次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32-33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32-39页。

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40页。

④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围剿”，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①对于整个中共革命而言，“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方针下的东方军与中央军并没能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反而使得红军战斗力大大削减，错失了准备第五次反“围剿”的宝贵时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一步步走向失败的结局。然而，在清流县人民的记忆中，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为当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

在当地文史资料的书写刻画中，东方军入闽作战这一历史事件尤其凸显出其永垂青史、极富意义的重要历史价值。据史料记载，清流于1931年5月建立了县苏临时政权后，伴随着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色区域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处于闽西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带的清流也面临着山高林密、地形险阻、团匪刀兵多、反动基础雄厚的困境。由于受到福建省苏对闽西“革命策略上又缺少积极向外发展的精神，偏重防御和保守”的指示，边区政权多次丢失，造成边区群众消极情绪日益递增，清流县城几易敌手，政权红白交错，仅一九三二这一年，清流县城先后五次失守，党的组织和县苏政权因而遭到极大破坏。^②而东方军此时入闽作战重创卢部及其他地主武装，在清流的东北开拓泉上苏区、恢复了归化苏区，彻底扭转了边区人民革命斗争打不开的状况，为清流苏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自东方军收复清流后，清流苏区更是蓬勃发展，至此进入了全盛时期。数据显示，1933年秋，清流全县已建立4个区、46个乡苏维埃政权，局势得到空前稳定。^③与此同时，清流苏区的工人领袖与工人干部等人才储备数量也大幅提升，“一九三三年七月间，以彭德怀领导的东方军打了胜仗后，县苏政权巩固，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在这一时期内，培养、锻炼了一批工人干部。”^④，为当时的苏区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后备人才保障基石。

工会的工作也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为了保卫胜利，工人们都组织起来了。”、“以后，我们城市人组织了工人模范排，负责城市的警戒工作，由理发工人出身的刘高升任排长。”、“工人中还抽调了一些人到经济贸易部门工作，如江汉宗、王魁梧到机关合作社；邹成林、吴福养到群众合作社；叶玉林到粮食部等。”。

^①毛立红.东方军入闽作战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J].军事历史研究,2014,28(02):18-24.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清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清流文史资料.第二辑》，1984年版，第18、20页。

^①而当地人民群众建设苏区的积极性和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革命自信心也大为增加，1933年2月，囿于敌强我弱的革命逆境，地处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区的清流域及嵩口、嵩溪等区乡先后失守，人民革命一度处于低潮。当1933年7月初由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的东方军挺进福建并取得石狮首战告捷后，时已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高坑村群众看到胜仗归来进入村庄的红军战士们，无比高兴。“村苏干部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热情地为红军搬运武器弹药，救护伤病员，千方百计为红军安排吃、住。”；曾目睹过这场战斗的曾大洪老人回忆到：“当时俘虏来的敌兵，经红军卸掉了机柄后，枪仍由俘虏兵背着，押回村内……红军的医务人员还为负伤的敌兵包扎伤口”，“当晚，在高坑休整的红军驻扎村内，群众纷纷烧水给他们洗澡。”，这一系列具体细节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高坑村人民心情是多么激动与欣喜，东方军的胜利驱散了长期笼罩在边区人民心头的革命消极、悲伤情绪，并且在作战过程中东方军向当地的人民群众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阀部队的优良作风与战斗素质，在当地群众的心中播撒下了加入红军、共同革命的种子，使得边区革命的火种愈发壮大。不难发现，不同的观察视角使得东方军入闽作战这一历史事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历史评价。在清流人看来，东方军克复清流为当地人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清流县人民对“苏维埃”政权发展历史时期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结语

探寻清流县的“苏维埃”记忆，复原清流人民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具体活动与革命逻辑，进而在比较中发现地方革命记忆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内容与特征，在差异与特性之中发现蕴含的共性，为我们研究中央苏区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启示我们从多视角去理解中国革命中的某一历史事件，尽量客观、公正、全面以待之，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中共革命的认识与理解。

附录：实践照片



红色文化研习营正式开营



红色文化研习营在英雄小号手雕塑前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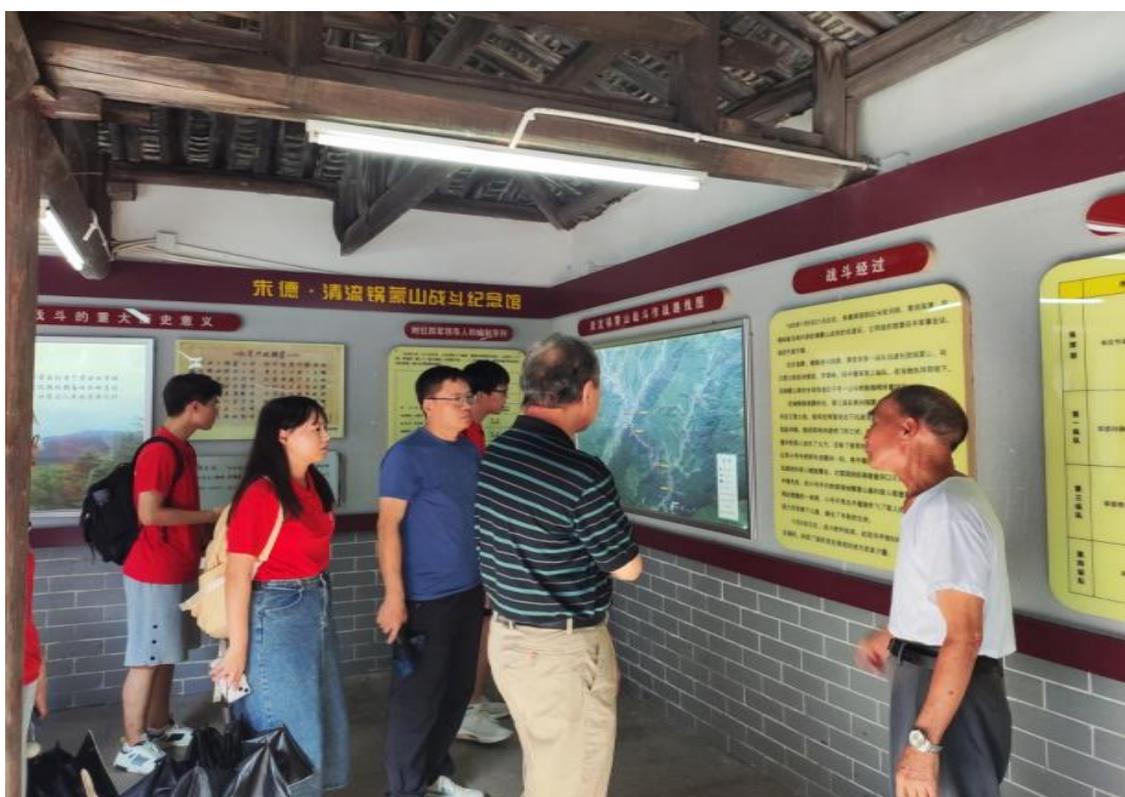
红色文化研习营在毛泽东朱德同志旧居的合影



红色文化研习营在毛泽东旧居（诒燕第）的合影



红色文化研习营在里田红四军驻地旧址的合影



红色文化研习营成员在参观清流锅蒙山战斗纪念馆



红色文化研习营成员在参观清流锅蒙山战斗纪念馆



红色文化研习营成员在参观毛泽东旧居（诒燕第）



红色文化研习营成员在参观工人夜校工人夜校（润晖第）



红色文化研习营成员在听里田村民介绍锅蒙山战役



红色文化研习营成员在参观毛泽东旧居



红色文化研习营成员在参观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旧址暨反“围剿”纪念馆